

河北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民国城市服饰研究——以北京、上海为中心的考察

姓名：王丽敏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专门史

指导教师：肖红松

20090501

摘 要

民国时期是中国城市服饰发展的重要时期。它结束了自古以来中国服饰“昭名分，辨等威”的制度和传统，人们的服饰趋向自由。伴随着中国传统服饰与非传统服饰、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融，在民国初年社会文化纷繁复杂的背景下，中国服饰进入了一个“乱”穿衣的时代。它形成了亦土亦洋、土洋结合的局面，使得这一时期中国服饰丰富多彩、百花齐放，甚至有些盲目、混乱。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服饰在造型、款式等方面才渐趋稳定。人们一方面全力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逐渐接受西方服饰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抛弃传统服饰，在这种情况下，融合中西文化特点的旗袍、中山装出现并定型，与同时盛行的西式服饰交相辉映。民国城市服饰的西服东渐并非偶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政治上否定了传统的“分等级、判尊卑”的服饰制度，打破了传统服饰单调、禁锢的色彩，使西方服饰进入中国并广泛传播；经济上封建小农经济已逐步向资本主义商业经济发展，西式服装布料的大量使用以及国外先进科技、手工艺成就的引进直接对服装成衣业的发展产生影响，造成服装公司和裁缝店的大量出现，促进了对服装的消费；思想文化上报刊、电影和服装表演等多种媒介对服饰做了宣传，使人们在服饰变革后观念更新，开始追逐时尚。同时与西方的接触和交流使西服东渐出现了高潮。其中夹杂着区域、阶级不均衡，盲目崇洋和中西兼容的特点。在西服东渐的基础上，传统的审美观念得到改变，中西融合的观念开始形成，服饰开始向个性化和多元化发展。

关键词 民国 城市服饰 服饰

Abstract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was the important one which the Chinese city clothes and ornaments developed. It ended china's old system and tradition that the status was classified by clothes and ornaments. People tend to dress freely. With the blend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lothing and non-traditional costumes, oriental civilization and Western cultures, under the complex social and culture background of Republic of China's first year, Chinese clothes and ornaments entered a "disorder" time of dressing. It formed the phase of tradition and unconventional blending together, so at that time, Chinese clothes looked plentiful and colorful, even some what sightless and disordered. Until the 1920s, clothes in sculpt and pattern tended to be stable. People got rid of feudal influence with all one's strength, and they gradually accepted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clothing culture, on the other hand they cannot get rid of the traditional clothing completely, in this case, cheongsam and Chinese tunic that merging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haracteristics emerged and stereotyped. At that time, business suit prevailed. Western-style clothes eastward did not happen accidentally, there were profound social and historical reasons: It ended china's old system and tradition that the status was classified by clothes and ornaments, traditional clothes' humdrum color got colorful, western clothes spread rapidly; feudalism economy gradually turns into capital commercial economic, macro western clothing and foreign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tool influenced slopwork industry, then many clothes companies appeared and promoted the consumption of clothes; newspaper, films and fashion shows publicized trappings, so people started to chase fash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tact with west made clothes inosculate very popular, accompanied with the unbalance of district and estate, fetishism, and so on. On this basis, traditional taste had changed, the idea that inosculatation with west had formed, trappings became individual and pluralistic.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Urban trappings trappings

河北大学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 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 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 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河北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所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致谢。

作者签名： 王丽敏 日期： 2009 年 5 月 25 日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河北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 1、保密 ☐，在 2009 年 5 月 25 日解密后适用本授权声明。
- 2、不保密 ☒。

（请在以上相应方格内打“√”）

保护知识产权声明

本人为申请河北大学学位所提交的题目为 《中国城市服务研究——以长三角为中心》 的学位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肖红松）指导并与导师合作下取得的研究成果，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是在河北大学所提供的研究经费及导师的研究经费资助下完成的。本人完全了解并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保护知识产权所制定的各项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河北大学的相关规定。

本人声明如下：本论文的成果归河北大学所有，未经征得指导教师和河北大学的书面同意和授权，本人保证不以任何形式公开和传播科研成果和科研工作内容。如果违反本声明，本人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声明人： 王丽敏 日期： 2009 年 5 月 25 日

作者签名： 王丽敏 日期： 2009 年 5 月 25 日

导师签名： 肖红松 日期： 2009 年 6 月 8 日

前言

服饰不仅仅是人们遮体、避寒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某种特定的文化。正如沈从文所说：“服装反映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穿着情操，还是一个民族深厚悠久的历史。”

^[1] 文化是服饰的灵魂，服饰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它见证了人类的历史发展。可以说服饰是除文字之外的另一种历史文献，它以独特的方式一方面向人类社会生动地展示和反映着一个历史时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内涵和社会风貌的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又体现人类的社会风尚，道德风尚，审美情趣，精神面貌和心理意愿等等。可以说服饰是一本没有文字的历史百科全书。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近 300 年的统治，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制度由此土崩瓦解。社会的变革、政局的动荡，再加上西方政治文明、西方社会思潮和西方生活方式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使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强烈的冲击。新旧事物的对抗、中西文化的交锋产生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这种纷繁复杂体现在人们的生活层面特别是服饰上，就是服饰的变迁，中国的服饰随着近代社会的变革、政权的更替而发生强烈变革，中国服饰史从此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它虽然没有政治变革那样轰轰烈烈，但就其表现出来的蓬勃发展的态势，及改变人们生活面貌的程度而言，绝不逊色于任何一次政治变革。

城市的产生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窗口，特别到了近现代，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也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城市化常被看作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城市已不仅是一张线形图或平面图，而是一个系统的、动态的、立体的社会，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载体和创造基地。近代社会生活现代化的种种变迁几乎是首先从城市发展开来的，尤其是近代的服饰变迁，从剪辫易服到西装革履，都是发轫于城市。城市成为流行服饰的发源地，尤其是民国的上海更是左右全国的流行趋势，即使南京、苏州、北京等大城市也唯其马首是瞻。

服饰包括服装和装饰两大部分，广义上说即包括从头到脚的服、服上的装饰方式和物品、人体上装饰方式和物品等。服包括头部的帽子、躯干的上衣和下裤等、足部的鞋和袜、手部的手套。饰包括身体的饰物如耳环、项链、发型和身体的改革如缠足、剪辫等。由于篇幅与资料限制本文只讨论城市的服装和相关的饰的部分。

民国时期服饰西“服”东渐，包括服饰样式、品种与穿着方式的西化现象都是服饰

西化的一部分。

在以往的有关服饰方面的论著，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不同时期的服饰进行研究，20世纪80年代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和周锡保的《中国古代服饰史》，成为中国服饰史研究领域的两本里程碑式的学术著作。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开创了服饰研究的先河，该书作者对从商朝到清朝各个朝代的服饰进行深入地探讨和研究。此书最宝贵之处是以不仅仅叙述服饰，还以服饰作为载体，论述了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风俗、伦理、哲学的变迁规律。周锡保的《中国古代服饰史》侧重于中国古代服饰文献研究，详细的对服饰资料进行了整理与归纳、分析。孙机先生的《中国古舆服论丛》虽然较晚，但他以名物考证的方法，在沈从文先生的研究方法上再辟蹊径，图、史、物互证，以切实的考证功夫复原服饰的原貌。王维堤著《中国服饰文化》则以流畅的文笔描述了中国服饰文化内涵。老照片编辑部出版的《老照片》系列中有许多幅传世老照片，这些老照片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的社会风貌，从中也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服饰的变迁。华梅的《服饰与中国文化》从中国服饰观念与中国哲学，中国服饰制度与中国礼制等方面阐述服饰与中国文化的深深不可分割的关系。

90年代以后中国服饰史的研究与写作进入一个繁荣期，诸葛铠先生的《文明的轮回——中国服饰文化》把上古时期与先秦的原始宇宙观相关联，把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服装史分成以礼为主的主流和民俗为主的小传统两条脉络，再辟一条较为虚拟的戏衣和舞台服装脉络。同时，它也把近代中国和当代中国服饰文化放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与冲突的背景下来考察，通过思想文化与服装发展实例的比较论述，书中揭示了文明轮回的大规律。孙燕京的《百年中国史话·服饰史话》论述了近代服饰的走向与服饰的文化透视。有关服饰史的论文主要有，有吕美颐的《中国近代女子服饰的变迁》、金炳亮的《民初女子服饰改革述论》、王开玺的《传统服饰与近代外交》、卞向阳的《论晚清上海服饰时尚》、李跃乾的《论辛亥革命前后的服饰改革》、张法的《中国服饰：从传统向现代演化的第一次浪潮》、高霞玲、成小明的《略论清末民初服饰变革的政治文化意义》等等。从这些论文中可以看出90年代以来的研究已经突破了史实性的简单描述，逐渐深入到对事物本质的揭示。

以往的近代服饰研究者，或是仅仅局限在某一阶段的服饰研究，缺乏对民国服饰整体变迁的描述；或是只对某个区域的服饰研究，没有注意到整个中国的服饰变化规律；或是只注意到单一性别服饰的研究，没有注意男女服饰在近代社会发展的共同特点。或

者有些研究者只注重“服饰”中“服”没有注重“饰”。还有些往往还侧重服饰款式的变化，注重服饰设计、服饰美学领域的讨论，而忽视服饰背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静态描述较多，动态的变化较少。本人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社会史学的范畴内，全面考察民国时期城市服饰变迁。但是由于篇幅、资料和本人能力所限，主要以考量北京和上海等大中型城市的服饰变迁过程，并挖掘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变迁。

第1章 民国初的“混乱”的穿衣时代

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在中国近 300 年的专制统治，绵亘数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也随之灭亡。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的革命，还带来一场服饰上的变革。服饰革命虽然没有政治变革那样轰轰烈烈，但就其表现出来的蓬勃发展的态势，及改变人们生活面貌的程度而言，绝不逊色于任何的政治变革。重要的内容之一即是结束了千百年来的“昭名分，辨等威”的古代服饰制度和传统习惯。皇帝皇后的龙袍凤冠、达官贵人及其夫人的补服，统统成为历史的陈迹。服饰上的等级森严，单调，繁琐，呆板的局面被多姿多彩，千变万化的景象所取代，社会上出现了“新礼服兴，翎顶补褂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爱华兜兴，女兜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2]的新局面。

这种新局面的出现，一方面是社会大变革、政局动荡但封建实力依然存在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西方政治思潮、政治文明和生活方式与传统东方文明交汇、融合的产物。这种社会历史的巨变使得民国初年的社会纷繁复杂，体现在生活层面特别是服饰上，则是一种独特的“乱”穿衣的社会现象。这一段时间，中国传统服饰和西方服饰、满族服饰和汉族服饰同时存在，相互补充，既丰富多彩、百花齐放，又带有盲目、混乱的时代特征。

1.1 “乱”穿衣时代出现

1.1.1 “乱”穿衣的时代

民国以后，服饰从此不再是“严内外、辨亲疏”的工具。服饰作为等级标志，除了特殊职业人士以外，任何人都可以穿上自己喜欢的各种各样的服饰，穿着爱好以一个人的审美为标准，这样就显得空前轻松、自由。西式服装也越来越多活跃在民国社会的大街小巷上，形成了中国传统服饰与西式服装并行不悖、相互补充的局面，使得这一时期中国服饰丰富多彩、百花齐放，甚至出现盲目、混乱的现象。在民国初年，大街小巷出现了中外人士服饰互换的现象，“中国人外国装，外国人中国装”，但是这种中西服饰交流的结果换来的却是着装上的混乱，“男子装饰像女子，女子装饰像男子”，显得不伦不类；在职业区分上，“女伶唱老生者，每多活泼大方，下台时，亦多着男子时装，如孟小冬及中原公司演员杨菊芬”，甚至出现了“妓女效女学生，女学生似妓女”的现象；^[3]

在服装款式上，形式也很多样，“西装东装，汉装满装，应有尽有，庞杂不可名状”，“一衣一服，莫不矜奇斗巧，日出新裁；”“同光之交，上海青楼之衣饰，岁易新变，靓装倩服，悉随时尚”，一时间“洋洋洒洒，陆离光怪，如入五都之市，令人目不暇接”，^[4]甚至一些追求时髦的女子把自己打扮得不满不汉，不中不洋，可谓不伦不类，令人啼笑皆非。如《百本张抄本大鼓书》中有一段“劝妻”，把这种装扮集中描绘了一番，真是维妙维肖：“一时高兴把四轮车套上，你这才打扮巧梳妆，拉字儿头不爱梳，你说不时样，如今晚前清打扮不吃香，你爱梳万字头，蝴蝶头，你不是革命党，一高兴梳一个日本朋头你要学东洋，不擦官粉把朱唇点上，前清的衣服改瘦去长，穿一件秃坎肩象个秃和尚，纽扣上带鲜花，你又没有进过女学堂；手绢掖底襟上，赤金的镯子又瘦又黄，戴一副金丝眼镜儿楞说把目养。马镫的溜子，凿的是如意吉祥。旗装打扮穿裙子，实在合样，汗巾搭拉有多长，散着腿裤儿不把腿带儿绑，穿一双上海坤鞋你楞说要改良，皮包以里把洋钱装上……”^[5]这些现象可谓是中近代史上的乱穿衣时代。这个“乱”可以表现为三点：一、代表不同的审美原则的各类服饰同时出现在街头，西装革履头戴礼帽的翩翩少年，拖着鞭子穿着长衫的老人还有穿洋装的都市女郎和裹着小脚的妇女，可以说“西装东装，汉装满装，应有尽有，庞杂不可名状”^[6]二、不同类的服装同时穿在同一个人身上。有留发穿长衫带洋帽的装扮，也有秃着头穿洋装的打扮，也有上身着西装，下身则着中裤扎绑腿，颇为滑稽。“民国成立之初，洋装风行于市，有少数老先生，亦制一袭西装，以资点缀，然大抵不惯，遂至束缚不自由。最可笑者，一些老先生着西装，不惯穿皮鞋，乃代以中国旧式双梁鞋，见者莫不以为怪现状云……或谓此皆外国舞台上之滑稽角色也。”“某君喜得中国料所制之西式衣服。一日，为初夏，某君新制纺绸单衫，意甚自得，以骄于人。其友谓之曰：“此所谓洋装的红楼也。”^[7]三、一些追求时髦的人不懂西装原有的搭配协调，乱穿一气。末代皇帝溥仪在结婚时因为不懂西装的搭配，而把西服穿在里面，头戴鸭舌帽。令他的洋教师庄士敦及其朋友大为吃惊和失望。^[8]

1.1.2 “乱”穿衣的原因

这种中西、新旧并行的乱穿衣的复杂局面出现的原因是：首先辛亥革命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大厦顷刻化为废墟，衣冠制度也随之成为历史的泥尘，人们在选择穿衣打扮时可以随心所欲了。人们脱下了旧的服饰，剪去了辫子，解放了双脚，在此新旧文明交替之际，旧权威、旧传统被打碎，新秩序、新权威还没有形成，人们心理上自然存在一种

失落和无所适从的感觉。而此时自从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传入，西方的习俗则地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中，并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中国人的观念。“在 1911 年以前约十年间的中国精神生活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外国的影响。中国人对外国生活怀着好奇心理并且倾向于采用外国思想，这种情绪自从 1860 年前后已在慢慢地增长，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又加速发展了。而在 1905 年以后达到了发狂的程度”。^[9]这个说法虽然有点夸张的成分，但正说明西方文明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如在通商口岸和租借出现在西餐厅、西式洋房、教堂里的中国人数逐渐增多。而在着装上，中国人开始对西式服装发生了很大兴趣，其简便灵活的款式很适应现代化生活的需要。于是受到中国人的喜爱，穿西装逐渐成为风尚。其次，虽然西式服装受到中国人的欢迎但并不是说其传播是畅通无阻的，百年来的服饰观念一旦养成，不可能一时间迅速消失，各种封建的服饰思想仍然存在。民国初年政府规定第一个服饰法令，主要是以西方服饰为样板。即《服制》对男女礼服，常服的样式、颜色、用料做出明确的规定。但是政府所推行的服制变革是一种强制行为，而人们对于旧有的风俗习惯，有一种观念上的依赖。对于变革则又有一个逐渐习惯的过程。所以政府规定的服饰规定基本上采用西式服饰为模板，十分不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于是“竟用西式，于习惯上一时尚未易通行。……故定新式礼服外，旧式褂袍亦得暂行适用。”^[10]最后，因为对西方文化接触时间比较短，对西式服装了解不成熟，渗透不够。造成了简单、盲目地对西式服饰的模仿。

民国初年是新旧交替时期，新的东西方兴未艾，旧的东西死而不僵。服饰的多样性，反映了这个时代特有的风貌。

1.2 从“头”到“脚”的革命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积极主张服饰变革。在他们看来清王朝的服饰是封建政治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标志之一，清王朝服饰的制度是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加以革除。这样废除清王朝服饰特征的男子留长辫，女子的缠小脚的运动就如火如荼的在中国大地上展开了。

1.2.1 头的变革

男子的很明显的服饰变迁是从“头”开始的，满族男子的风俗习惯是剃发留辫，剃去头颅四周头发，保留头顶头发结辫下垂，这一习俗为“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的汉人所不能接受，为此曾酿就了许多血雨腥风，尤以大清王朝鼎立之初的激烈的剃发斗争。

“扬州十日”、“嘉定屠城”最为悲惨。剪辫子已经不仅仅是外观上的变革，而且也是政治制度的改革，还是整个社会变革的一种象征。于是在晚清一些有识之士把剪辫看成社会变革是否能顺利进行，国家和社会是否能够发展的关键问题。在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的康有为奏请光绪皇帝：“今万国交通，一切趋于尚同，而吾一国，衣服独异，则情意不亲，邦交不结矣。且今物质修明，尤尚机器，辫发长垂，行动摇舞，误缠机器，可以立死。今为机器之世，多机器则强，少机器则弱，辫发与机器，不相容者也。且兵争之世，执戈跨马，辫尤不便，其势不能不去之欧、美百数十年前，人皆发辫也，至近数十年，机器日新，兵事日精，乃尽剪之，今既举国皆兵，断发之俗，万国同风矣。垂辫既易污衣，而蓄发尤增多垢，衣污则观瞻不美，沐难则卫生非宜，梳刮则费时甚多。若在国外，为外人指笑，儿童牵弄，既缘国弱，尤遭戏侮，斥为豚尾，去之无损，留之反劳。断发虽始于热地之印度，创于尚武之罗马，而泰伯至德，端委至吴，何尝不先行断发哉？”

^[11]康有为从科学的角度分析了留辫子对外交，经济，军事，卫生以及维护个人尊严的诸多不利。只可惜变法昙花一现，剪辫主张终因阻力重重，没有能够付诸实践。至辛亥革命，才具摧枯拉朽的力量，南京临时政府连续发布了要求剪发辫、禁缠足、禁烟、禁赌等一系列文告法令，把移风易俗当作除旧布新的重要手段。孙中山在《大总统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文》中称，“今者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国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以除虏俗，以壮观瞻。”^[12]于是剪辫与否又成了是否革命的标志。全国剪辫运动风风火火地进行起来。一时全国上上下下，尤其是汉族男子都争先恐后地剪辫子，一些地方还联合多人集体剪辫，并燃放爆竹，举行公宴庆祝。剪辫成为民国服饰变革的一大成果。然而各个城市剪辫的进展情况并不一样，“云南在11月5日一独立，军政府就张贴告示，要求在5天之内所有留辫者一律剪辫11月10日，期限已到，军政府派出士兵到各处剪辫，一天之后，昆明城内已看不到辫子了。”^{[13] (P542)} “然而沪上光复已两月有余，辫子仍未除净”。^[14]

^(P548) 在传统的中国一旦某种习俗先是以时尚的形式风行起来，经过激荡、沉淀而溶入到百姓的生活中，形成形态比较稳定的风俗，这种稳固风俗习惯就很难在风化未开的百姓中改变。所以在剪辫的运动中出现了强制剪辫的现象。英国驻南京领事就留下了这样的记录“驻在南京的浙江部队用很特殊的方式庆祝孙文博士当选为临时总统。白天，他们的队伍带着剪刀做武器在各主要街道上游行，对他们遇到所有那些蓄辫的中国人，一律用剪刀剪去辫子。他们不分老幼贫富，所有人的辫子都遭到同样的命运。”而这些

人“完全是遭到突然袭击，没有机会避免士兵们在旁观者的嘲笑中当众强迫剪辫所带给受害人的那种侮辱。”^{[15] (P549)}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毕竟是信奉自由、平等的阶级，一些地区的政府呼吁剪辫自由。军政府在《通令军人剪辫告示》中明确指出：“对于普通人民，剪辫与否，原可听其自然，不以政令干涉，而军人为齐民之表率，肩光复之巨任，不能稍事姑容。”^[16]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和革命的反复性，在民国初年的大街上经常可以看见剪辫西装革履的少年和拖着长辫子的长衫老人。

剪辫浪潮不仅是一场政治运动同时也是不可阻挡的近代社会风尚，一时间，辫发一物，顿觉稀罕；西式冠裳，风行一时。虽然在此时期内顽固势力和封建习惯还不能完全消失，托着辫子，身着长袍、马褂的人依然可见，这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乱”。但是历史的大趋势是挡不住的，它表明人们思想的觉悟，社会与时代提供了相对宽松的个性发展空间。

1.2.2 脚的解放

在男子剪辫运动在大规模进行时，女子的放足运动也在轰轰烈烈的进行，女子的服饰明显的变化相对于男子的服饰变化是从脚开始的。缠足是中国妇女独有的以摧残女子之足为美的陈规陋俗，历经千年，蔓延极广。遗风旧俗，极度难改。早在清朝初满清统治者因裹足本不是清朝的祖制，反对缠足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康熙三年所下的诏令规定，“若康熙元年所生女子违法缠足，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两部议处；兵民之家则交付刑部责 40 板。”^[17]但是到了康熙七年却不得不禁罢，实在是因为多年的风俗影响久远，深入人心，缠足观念根深蒂固，非一朝一日、一道命令可以禁绝。因此，清廷的禁令只是约束住了八旗女子，对汉族女子无可奈何任只好“松弛了这道禁令”^[18]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深入传播，西方的政治制度，风俗习惯也随之影响了一大批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接受了不少的新思想和新观念，对摧残女子的缠足丑陋风俗深恶痛绝，此外，西方国家将中国女子的三寸金莲作为笑料，也给在国外的中国知识分子以极大的刺激。因此，近代中国的许多有识之士，希望中国改变积习，希望中国强大起来。而强国与强民是联系在一起的，国民的身体之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之母。^[19]因此，反对缠足让妇女解放就成为爱国的有识之士的共识。但是最早在 19 世纪 60 年代中国有组织的反对缠足，宣传、实践放足、不缠足，是从西方教会在中国办的教会女校开始的。其后，太平天国革命，也禁止缠足，主张天足，并赋予了实践。进入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康有为、谭嗣

同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呼吁废除女子缠足。并在上海成立了不缠足会，以上海为总会，在各省成立分会，不缠足运动大规模展开。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要求禁止妇女缠足从而把这一时期的不缠足运动推向了高潮。在这份给光绪帝的《请禁妇女裹足折》中康有为陈述了缠足的痛苦与残忍“方今万国交通，政俗互较，稍有失败，辄生讥轻，非复一统，闭关之时矣。吾中国蓬荜门户，蓝缕相望，加复鸦片熏缠，乞丐接道外人拍影讥笑，讥为野蛮久矣。而最骇笑取辱者，莫如妇女裹足一事，臣窃深耻之，”奏“请禁妇女裹足，以全肌肤。”^[20]康有为把缠足与国家的声誉联系起来透辟分析了妇女缠足的恶果还将缠足陋习与一个国家的强弱相联系试图以此说动统治阶层从而自上而下强制推行妇女放足运动。在顽固派的阻挠下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这一时期的不缠足运动也很快遇到了挫折。到民国成立，临时政府内务部根据孙中山的指令迅速通飭全国各省要求当地政府立即采取各种措施严禁妇女缠足严正指出“已缠者令其必放未缠者毋须再缠倘乡僻愚民仍迷不悟或编为另户以激其羞恶之心或削其公权以生其向隅之感”^[21]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央政府第一次以强制性的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废除缠足恶习。受到政府地支持，不缠足运动在全国范围普遍高涨给妇女生活带来了明显的变化。1912年《申报》这样记载了当时的放足状况：“昔日女子缠足多，今日女子多天足。昔日女子谨守闺中羞不见客，今日女子靴声橐橐，马路中疾行如飞”。^[22]由于南北方地区差异和宣传的力度不同，但是总体来说无论南方和北方城市，由于缠足相对于男子剪辫不怎么带有所谓的政治色彩，对在城市里的女子产生了很大影响，大部分已经放足。一些年轻的都市女子开始穿皮鞋，更对西式的高跟鞋趋之若鹜。

不缠足运动可以说中国女性服饰上空前的一场大变革，具有十分重要的革命意义。它使女子的双脚解放了，也是对女子的头脑和思想的解放，为女性的解放积极投身于革命活动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

1.3 现代文明新装的出台

1.3.1 男子的现代文明新装

民国初年，男子剪辫子之后，有的改成简便的西式发型，有留齐耳短发披于脑后的，有中间梳开分于左右的，还有后梳式，一边倒式。多数男子则选择了戴帽子。帽子最初没有规定，形状也是各式各样的。有复古的明朝巾，还有僧帽、戏台上的员外帽。最流行的还是与西装相配的。“比如有一款“帽沿兜住怕风吹，夹线教君莫暂离”，应该是类

似于马草帽的大沿帽；还有一种纸做的帽子，“柔软尤夸好卷收，原来共知不”。当然，这类从外国直接进口的帽子，价格都非常可观，般呢帽价低昂，至少还须两块洋”，“帽盛通草大而轻，价贵还贪制”。为了省钱，也有人用中式材料来仿制：“素缎中行密密纹，俨同两无分”，“尚有丝绒合建绒，将他制造也同工”。民初一些大城市的报刊，往往是一边提倡剪辫，一边大做推销洋帽的广告。”^[23]如天津最著名的《大公报》经常登载这类广告：“本号现研究各种洋帽，如礼帽、普通帽、猪帽等以供剪发同胞之购用，不日即将出现。并发售各种剪发器具，华制居多。”^[24]

传统的长袍马褂在近代的服饰潮流中没有消失而是经过吸收了一些西式成分得到了改良，如“大襟右衽，长至足果上二寸，袖长与马褂齐平，两侧下摆各有一尺左右的长衩。”“马褂是对襟窄袖，下长至腹。”^[25]民国初年相对于晚清时期穿西式服装的人较多，因西式服装相对于长袍马褂来说更加简单灵活，方便快捷。男子的西式服装主要指“成套的、大翻领的、需要配合领带的套装”。^[26]在民国比较流行的西式服装主要是西装和学生装（学生装指清末引进的日本制服一类的服饰）。上海，出现了穿用西方服饰的潮流。“迩来剪辫西装者日益多。”^[27]“试一游都市，触于吾人之眼帘者，簇簇然几于无一不头戴洋帽……”^[28]随着西服流行带动了西服的广告和公司的增多上海冠华、惠罗等各大衣帽公司争着在《申报》上发广告，以西式服饰用品招引顾客。这些公司的老板们“盱衡世变，冠服一端，倾向同……”^[29]大量进口西式衣帽服饰用品。兴丰服装公司也在《申报》上发广告说：“本号向办洋装衣着，早经驰名中外，民国军光复大汉以来，各省热心志士，无不纷纷改装……本主人有鉴于此，特向各国名厂定造应时各色纯毛呢绒哔叽衣料及改装应需各种杂货……”^[30]

当时较保守的中年人及公务人员交际时的礼仪装束喜欢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小帽或呢帽，下身着中式裤子，足蹬布鞋或棉靴。而一些革命者、政治家喜欢穿西装“革命巨子，多从海外归来，草冠革履，呢服羽衣，已成惯常；喜用外货，亦不足异。无如政界个人、互相效法，以为非此不能侧身新人物之列”^[31]另外一些思想激进的青年学生喜欢穿箱形结构，直立领、胸前有一暗插袋的制服式学生装，头戴鸭舌帽或白色阔边帆布帽。

1.3.2 女子的现代文明新装

进入民国后，女性们逐渐领悟到曲线美的道理逐渐改变了传统宽衣大袖的穿衣习

惯，把衣服改变的更加称身适体以显示女性体态之美。女子服装在细节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将上身的袄衫的腰身收的更加窄小，衣领开得很低，袖长不过下肘。下摆有弧形，直角，圆角等多种变化，领，袖，襟还饰以不同的花边。裙子也较以前的下垂及足略为缩短，有的还完全取消了褶皱任其自然下垂裙子的边缘也绣以各种花边，有的则加上五彩珠宝，闪闪发光，富丽堂皇，甚至还有人模仿西装的形制，将袄衫制成对襟翻领的样式，形成中西合璧的特色。这样经过改造的上衣和下裙在当时颇为流行被称为“文明新装”。到“五四”时期，白衣黑裙已成为学生典型的装束了。白与黑色彩的选择，突破了传统服色禁忌，因为白色在历史上都是丧服的颜色，而黑裙在清代则是寡妇特有的装束。

服装变化了，相对的配饰也发生了变化。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社长陈鸿璧，在上海爱华公司设计出一种女士礼帽称为“爱国帽”。其宣称：“冠服为礼仪之表章，泰西诸文明国无论男女皆具冠赏，吾华女界独科其首于宴会广众中，殊失大雅之风。同人鉴于此，特集厚资，以中国绸缎巧制成帽，既美观且极卫生”。爱国女帽迎合了女子爱美的心态，又以爱国为招牌，一经投放市场，就有“应付不暇之势”。^[32]除去女子戴帽，女子剪发也是当时的一种时尚，甚至在湖南还成立了“女子剪发会”鼓励妇女剪发易服做民国的新公民。^[33]于是妇女们纷纷将飘逸的长发剪成了齐耳短发，自有一种特别的风采。不剪发的女子在突发的样式上也翻了新样“妇人之装束是足翻新花样者，莫如头发，即刘海发一种，已有种种之不同。有圆者，有尖者，有高者，有平者……，大似云雾扫尽，乃见清光。”^[34]辫子也改为梳髻“……有把髻梳在前面象一朵花像一个蝴蝶似的，也有梳在头顶上似的，梳在两旁边的，梳在后头的，有千百个式样。”^[35]

女子放足后终于可以走出家门，缠足相关的弓鞋逐渐被淘汰，人们纷纷穿上了西式皮鞋或布鞋。“当中国妇女缠足之风盛行时，无论如何履必自制，且双弓藏诸裙底，往往不使人见。自提倡天足后，渐臻大方，无此羞涩之风。故往往履不自制，而购肆中，且在广众中脱履露足以试履之大小者”^[36]可以说女性的着装思想在当时也发生了变化，更加开放了。一些年轻的都市女子开始讲究鞋的式样，穿着皮鞋，更对欧式的高跟皮鞋趋之若鹜。于是上海就出现了专门制鞋的专门鞋匠，如有个曾被称为“吃素人”的鞋匠，以拎包上门为女客服务，并根据他们的要求设计各种新式的皮鞋，之称的皮鞋样子新颖，很受女性欢迎。^[37]（P29）《申报》曾对这种变化作了形象地描述：“往来短巷复长街，革履声喧臭之偕；转眼清明佳节近，无须重绣踏青鞋。”^[38]

1.4 女子不伦不类服饰的整顿和以“露”为美的女装责难

民国初年服饰上的追新求异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时尚,在这个方面上男子的服饰没有太多的变化而是更多的趋向西式服饰。但是相对于本来就对服饰很敏感的女性来说,尤其是追求时髦的女性的服饰向随意性、多样性、奇异性发展。这就在社会上出现了一系列的对女子不伦不类服饰的整顿和社会对以“露”为美的女装的责难。

1.4.1 女子不伦不类服饰的整顿

对女子服饰的整饬首先是从女学生开始的。民国初一些女学生的穿衣打扮,言谈举止在当时尽领风骚,却遭到社会和媒体舆论的非议。《女子时报》一篇文章这样描写上海女学生的服饰“一衣服也,中国绸缎不足,有用外国绸缎者。不独材料已也,裁式之新奇实有不可思议者,领高至四寸以上,而纽扣也,花边也,又各花样翻新,鲜艳夺目”。^[39]更有人在街头看到这样一景,有几位女学生,“观其脚,是摩登少女;观其腿,像英伦的绅士;观其胸,又如五色的老虎;观其面,与舞场中的舞女无异;在观其发,光彩如电闪,配上各式发结,一走一颤,颇有飘飘欲仙之势”。^[40]而且由于女学生的过于艳丽招摇被认为是仿效妓女,《大公报》这样描述广东的女学生的打扮“她们穿着猩红袜裤,脚高不掩胫,后托尾辫,招摇过市。其始不过私娼荡妇所为,继则女学生亦纷纷效法。”^[41]还有人在《妇女时报》上发过这样的言论“夫上海为妓女荟萃之地,服装之绮丽为社会所公认,今以文明之女学生而效尤之,试问迷离扑朔,又孰能辩其是耶。”^[42]认为服饰仿效女子是自甘堕落的表现。

基于女学生的奇装异服,地方政府采取了整顿措施如:广东教育局发布告说云:“……部令女学生自中等学校以上著裙……细泽部领旨趣盖以中学学生年龄渐长,藉此昭礼容之整肃,非欲别学校之等差。本省……此后除中学以上女生必须着裙外,其小学生凡14岁以上已届中学年龄者亦一律着裙,裙用黑色,丝织布制均无不可,总须贫富能办,全堂一致以肃容止。”^[43]同时学校也对此做出了类似行动。苏州和无锡省的一些学校要求本校女学生必须着校服,不着校服立即开除,为此有些女学生被开除出校门。

对女学生的服饰整饬也得到了一些有识之士的重视和支持,有些地方还设立了各种团体,以压制这种风气蔓延。如女校长朱德裳就在影珠女校设立了女子崇俭会,她宣布“女子于衣服首饰等项,消耗尤巨,况现已提倡剪发,更无需用首饰之必要,特集合同志数人,发起女子崇俭会。”^[44] (P66) 当时入会者很多。由于各方面的关注,和当局的一

定的措施，女学生的盲目追求时髦的趋势有所减缓，女学生的服饰逐渐朴素大方，到了五四运动前后白色上衣黑色下裙成为女学生的典型装束。

民国初年女学生的服饰上追新求异反映了传统审美标准受到了冲击，个性解放，自我审美成为审美的潮流，然而盲目追求奇装异服势必造成不良的风气。

1.4.2 以“露”为美的女装的责难

民国初年，人们的衣着观念逐渐现代化，如女子着装开始突出女性形体之美，服装向自然、简约、美观的方向发展。一些服装以“露”来突显女性阴柔之美。但是这种以“露”为美的服饰与中国传统伦理规范和审美心理是格格不入，在当时相对传统的社会风尚里是不允许的，1917年夏季，京沪等地开始流行无领、袒臂、露胫的女子服装^[45]立即遭到当局和媒体的强烈的反对。《上海时报》云：“近日女界中流行一种女服，则衣无领而秃颈也……迹来风尚，妇女界渐渐欲以内体示人，如裤短之渐露其胫也，袖短之渐视其臂也，今既秃颈，则不久将呈其玉雪之胸背。是乌可哉，是乌可哉！”^[46]（P56）北京警察厅在通告里说：“查近来衣服样式竟为奇异，几于不中不西。而妇女衣服日趋紧小，亦殊失大家风范，此等服式即在燕局私第犹属不庄，若于公共集合场所服之游行，实于风俗观瞻两有妨害。本厅有维持风化之责，为此示仰一体知悉，嗣后各宜自重，不得故着奇装异服致于例禁。各该家长亦宜随时告诫，默化潜移，俾服妖永禁，风化日端。”^[47]尽管一再禁止“露”的服装的出现但无实效。到1918年后这种女装仍风行一时。1918年夏，上海市议员江确生致函江苏省公署：“妇女现流行一种淫妖之时下衣服，实为不成体统，不堪寓目者。女衫手臂露出一尺左右，女裤则吊高至一尺有余，乃至暑天，内则穿一粉红洋纱背心，而外罩一有眼纱之纱衫，几至肌肉尽露。此等妖服，始行于妓女，夫妓女以色事人，本不足责，乃上海之各大家闺秀，均效学妓女之时下流行恶习。妖服治容诲淫，女教沦亡，至斯已极。”^[48]但还是禁止不住。到1920年仍有针对女装的公告出台。

服饰的流行以个人爱好，个人审美为基础的，绝不是当局的一纸公文能禁止的。他们对女子的新式服饰以及审美趋势的非议，是传统心理的体现。虽然禁令不断出台，然而新式女装博得众多女性的欢迎，其是魅力势不可挡的。

第2章 民国“稳定”的穿衣时代

20年代后的服饰对于民国初年的“混乱”来说，可以说是“稳定”时期。从服装的造型、款式等方面来说，这个时期的服饰经过重大的变革，一方面在穿着上全力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逐渐接受西方的文化的影响、尤其是西式服饰的简单、美观而且很合适现代的生活方式，但是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抛弃传统服饰理念，便吸收西方精华改进传统的服饰缺陷，于是中西合璧的服饰——旗袍、中山装，这种稳定的服装形式应运而生了。可以说中山装、旗袍是代表中国的民族的特色国服，是中国人民大众和伟人的智慧结晶。在旗袍盛行的时代里，各种西式服饰也竞相出台，和旗袍交相辉映，加上近代工业的发展可以大批量生产服饰，于是中国的时装应运而生了

2.1 中西融合的结晶——旗袍、中山装

2.1.1 旗袍

旗袍是指满族旗人所穿的长袍，它吸收了辽、金服饰以及蒙古族服饰中的袍服制，形成了本民族特色的服装。但只有八旗女子所穿的长袍才与现在的旗袍有“血缘”关系。清朝的旗袍样式以宽大为特点，造型线条平直硬朗，衣长至脚，“元宝领”用的十分普遍，领高盖住腮并碰到耳垂，袍身上绣上各色花纹图案。领子，袖子，衣襟处有许多宽大繁琐的滚边，到晚清整件衣服全用花边镶滚，都难以辨别衣服原来的颜色，其衣服之繁琐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1911年，辛亥革命风暴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同时也使旗人的袍服走上暂时的没落，人们三百年来终于可以一吐对满清政权的不满，使“大拉翅”“花盆底”等满族女子的装束一夜之间销声匿迹。旗袍在民初穿着者甚少，满族女子的长袍外罩马夹的旧式穿法已显得颇为落伍。不复昔日统治者地位的象征。这时的旗袍仍以宽大为主，领子仍为“元宝高领”，最高时可与鼻尖齐平；袖子稍有缩紧并略有缩短，至肘与手腕之间；袍身长度减短至膝与脚踝之间。旗袍线条造型较为平直，色调力求素雅，领、袖、襟等部位也用镶滚，但比以前简练概括的多，通常只有少许几道，绣纹也趋于简单。从这时起，旗袍开始注重体现女性曲线美，追求自然的装饰效果，不再以装饰体现地位与身份，这与民初崇尚自然新生活的社会风气密切相关。

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具有现代意义的现代旗袍产生了，并开始在上海，北京等城市流行。上海是当时公认的服饰时尚中心，因为上海开埠最早，得风气之先，特别是

服装“一衣一服，莫不矜奇斗巧，日出新裁。”^[49]而北京、南京等地“妇女衣服，好时髦者，每追踪于上海式样。”^[50]上海又是妇女寻求解放的重镇。传教士、商人、革命党人竞相创办女学，掀起了一股女权运动浪潮，寻求解放的社会大气候荡涤着服饰装扮上的陈规陋习。20年代中期的“新式旗袍先是以马甲形式出现的，加在短袄上，稍后镶滚装饰，面料也改为轻薄，多印花。”^[51]后将长马甲改成有袖的式样，也就成了新式旗袍的雏形。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女学生是旗袍流行的始作俑者。“以当时其‘女界领袖’的衣着引领地位和对西化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而论，也只有她们才可能是旗袍最早的主要使用者。”^[52]当时的女学生作为知识女性的代表，成为社会的理想形象，她们是文明的象征、时尚的先导，以至社会名流，青楼女子等时髦人物都纷纷作女学生装扮，女学生视为当时潮流领袖，“女学生是女界的领袖，有作先锋的义务；所有各种妇女问题；该当先由女学生做起……”。^[53]但是这时穿旗袍的人仍不是多数，只限在城市的知识界、商界中比较流行。

20世纪30年代是旗袍的盛行时期，旗袍成为城市女性的主要服装。穿旗袍的风气很快从上海风靡全国各地，呈现出“中西合璧、变化多端”的特点。这时旗袍造型完美成熟，后来的旗袍始终难以跳出该种窠臼，只能在长短、胖瘦以及装饰上略作变化而已。当时的样式变化主要集中在领、袖及长度等方面。先是流行高领，领子越高越时髦，即使在盛夏，薄如坪翼的旗袍也配上高耸及额的硬领。渐而又流行低领，领子越低越“摩登”，当低到无法再低的时候，干脆就穿起没有领子的旗袍。袖子的变化也是如此，时而流行长的，长过手腕；时而流行短的，短至露肘。至于旗袍的长度，更有许多变化，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流行长的，走起路未无不衣边扫地。以后又改成短式，通常的时装长度都在膝盖以上。除传统的两边开衩外，还出现了前后开衩，左右开襟的双襟旗袍。旗袍局部的西化表现在领、袖处采用西式服装的装饰，如荷叶领、开衩领、西式翻领及荷叶袖、开衩袖，有的下摆也缀荷叶边并做夸张的变形，以求美观。这时，旗袍的花案也受到西方风格影响，色彩鲜艳，花型大而自然立体。30年代大量纺织品的进口，使得旗袍面料更加丰富，纱、绉、绸、缎花呢、棉布等，应有尽有。当时特别流行用条格织物和风靡一时的阴丹士林蓝布做旗袍，深受女学生、职员和大家闺秀的喜爱，阴丹士林也一度成为女性的代名词。^[54]（P263）旗袍之所以很受欢迎，其一是裁剪制作比较简单，免去了上衣下裙的制作上艺，很适合家庭妇女自己裁剪制作。其二是衣料的档次可高可低，可以是高档的锦缎、丝绒，也可以是极普通的阴丹士林市、民间的蓝印花布等等。前者

雍容华贵，后者朴素大方，任何阶层的女性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布料。其三是旗袍的线条简练，优美大方，适宜表现女性的曲线美。其四是适合各种年龄的女性和各种场合穿着。

40年代的旗袍是30年代辉煌的继续。40年代初期，抗日战争硝烟正炽，当时大多数人们无心在服饰上下过多功夫，经济萧条，物资匮乏，物价飞涨，尺丝寸缕非常昂贵，衣料价格上涨迅速。所以这一时期的服装穿着倡导“旧衣运动”。当时颇有影响的《申报》元旦新春例发衣食住行计划，“在这国难深重的日子，正应节约救难，提倡穿旧衣运动，衣服新旧无关宏旨，但求有新思想，新脑筋就好了……。”^{[56] (P101)}出于经济、便捷活动等实用功能的考虑，旗袍长度缩短至小腿中部，高时到膝盖处。炎夏季节多倾向于取消袖子，领的高度减低，省去了种种繁琐的装饰，使其更为简便、适体。在旗袍的用料上，40年代的旗袍迎合时代需要普遍适用国货，国内的厂家竞相生产人造丝、人造羊毛以代替丝与羊毛，与舶来品相抗衡。土布也成为旗袍常见的用料。“抗战胜利以后，旗袍又进行了改良。短袖旗袍上也开始有肩缝，变得更为适体。40年代中期，旗袍还引进了两种西式配件——垫肩与拉链，把传统的盘香扣、直角纽换成拉链，也成为当时的时尚之一。旗袍的面料也广泛采用镂空料、花边、珠片、亮片等做装饰”。^{[56] (P102)}归纳起来，40年代旗袍变化总的趋势是长度减短，更为合体，更能表现女性曲线，暴露程度有所加大，配穿方式层出不穷，穿着范围更加广泛。

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旗袍经历中西合璧的改良，终于形成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服装，这种稳定的服装形式成为城市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1.2 中山装

在民国中西合璧带有民族风格的女装的旗袍出现了，而对应的男装也就是中山装也流行于民国时期，不同的是旗袍是人民大众的智慧结晶，中山装则是孙中山这个伟大领袖的智慧。孙中山先生不但是革命的先行者，而且也是近代服饰改革的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他把变革服饰同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紧密联系，率先着西服，此后又亲自设计创造了中山装。孙先生创造中山装的不是偶然的，这与他所处的社会背景密切的联系。其一，辛亥革命后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均无统一礼服，一些临时政府的官员经常出席重要的国务活动和会见外国使节，在这些重要场合，穿什么样的服装关系着代表国家的礼仪和尊严成为问题。不少地方政府及商会均致书电政府希望统一礼服。同时，由于西服的原

料多采用进口呢绒,助长了洋货尤其是服饰原料在中国的倾销,这就带来了严重的经济问题—白银外流。“辛亥革命以后在武昌一地,因改穿西式服装而输出白银就有2000多万两;天津在1912年春,一个季度进口洋服、洋帽输出白银达125万”^{[57] (P61)}孙中山不无感慨道:“礼服在所必更,常服听民自便……礼服又实与国体攸关,未便轻率从事。且即以现时西式服装言之,鄙意以为尚有未尽合者……此等衣式,其要点在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同时又须丝业、衣业各界力求改良,庶衣料仍不出国内产品,实有厚望焉。”^{[58] (P62)}因此孙中山先生产生了设计制服的动机。其二孙中山先生早年留学美国,后又去了日本,在接受西方教育期间,常穿西式服装,在各种革命活动中,也穿西式的军服。西方的立体剪裁,和传统的服装截然不同,孙中山感到西装穿着不便,而中国原有的服装过于陈旧、拖沓,因此,亲自致力于新服装的创制。孙中山先生于“1923年任广东大元帅时,主张以当时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设计新装。”并用洋服店老裁缝黄隆生当助手,制成世界上第一套中山服。^①

中山服的形制基本确立于20世纪20年代。其主要特征为:由底领和翻领构成领子,是领角呈八字形的立领;上下有四个加袋盖贴袋,胸袋袋盖呈倒山字笔架型,称为“笔架盖”;下边两个为吊袋,即袋边沿活口的口袋,俗称“老虎袋”(袋边沿有伸展活口的口袋),四个口袋都以纽扣扣合;前门襟五粒明扣(最初七粒);袖口上各有三粒扣子;最初的后背有腰带、背缝和开衩,以后取消了腰带和开衩。南京国民政府到20世纪30年代将中山服列为公务员服装。将中山服的四个口袋喻为“礼、义、廉、耻”;胸前五粒纽扣喻为“五权分立”;袖口的三粒纽扣喻为“三民主义”之说。孙中山建立民主共和体制的三民主义理念在服装上得到完整体现,中山装成为“革命”在身体空间中的象征符号。此外孙中山还参照西裤式样,设计了中山装裤子的前面开缝,一律用暗扣,左右两翼各置一大暗袋。右前部分设一小暗袋,俗称表袋,也可藏用小物品。此外,裤袋的腰部打褶,裤管翻脚,也异于其他服装,成为中山装的特色之一。

从民国初到40年代里,除了西服和马褂,中山装成为民国城市中上层男子主要穿着的形式之一。一方面,因为中山装是在革命风暴汹涌的年代,彻底推翻封建制度,适应时代需要而产生的,表现冲破封建束缚,代表着服装改革的趋势、因而容易引起群众感情和思想的共鸣,自发地竞相穿着。同时也是政府的提倡,特别是1928年,革命

^① 中山装的诞生有两种说法,另一种说法是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结合学生装以及西式军服和中国的国情,在上海荣昌祥红帮裁缝王才运的帮助下缝制。

军北伐成功，全国获得统一，当时国民政府将孙中山先生所创造的，并带头穿着的服饰命名为中山装，以示纪念。政府工作人员及公教人员穿着国产的中山装作为规定的制服，表示国民政府忠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以穿中山装作为一种政治象征。另一方面 40 年代后期，中国实际一直处于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战乱时期，并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西方帝国主义的掠夺，贫富差异很大。物质利益首先落入官吏和资本家手中。他们一面西装革履，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公开场合换一副面孔，身着中山装，表示他们廉洁奉公，以达到政治目的。一般平民和农民，挣扎在饥饿线上，只能有什么穿什么，基本保持传统的中式短袄裤，而大部分贫寒的小职员、教师，虽然家无隔夜粮，仍要准备一套棉布中山装，既是制服还是礼服，应付“衣帽看人”的社会。它只是在公职人员、教育界等一定范围内盛行的服装形式。

尽管国民党在 1928 年到 1936 年间在社会上推行中山装，力图将中山装塑造为革命的、进步的、时尚的服装，推广到全体国民的重要装束，但着装是个体行为，这不是政府所能干预的，城市的中下层人们穿之甚少。穿中山装的人群主要是在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新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出现的党、政、军、学界，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比较早，也比较深广，他们也是最早改革服饰的先驱，很早就剪去为洋人鄙称猪尾巴的封建落后标志，改易中装穿着洋装，是与封建制度决裂的革命行动。而作为炎黄子孙，他们又对几千年民族文化传统有着浓厚的情感。孙中山先生所提倡的服式，吸收西方款式的优点，打破了中装连袖、无袋等不合理结构，与西服相比，改开敞的领型为封闭式立领，适合体型，自然庄重，具有东方人的传统与风度。由于共同理想和敬仰孙中山先生个人的政治威望，很快被他们所认同。

中山装的出现，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结合民族特点和现代化服饰特点创造出来的服饰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

旗袍和中山装的出现有特定的历史原因。一、反映时代转折。在推翻清王朝后，中华民国政府制定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学习西方进步技术、实施中国现代化的实业方针，其意识形态也在发生新的变化，掀起新的风俗、新的观念。服饰也不例外，于是在伟人和大众的智慧中创造中山装和旗袍，这是向几千年封建传统服饰挑战，它成为了 20 世纪中国服饰逐渐西化的转折，反映了中国服饰的新时代的到来，代表着中国服饰从传统走向现代。二、适合中国国情。民国后，一方面实施实业及西方文明的进步影响，中国社会发生着惊人的变化。社会生产由手工业生产时代步入机器时代，租界内西方资本主

义工业的发展和民族工业的迅速成长，社会化的大生产所形成的高度紧张的生产劳动，加快了人民生活的节奏。封建社会的服饰制度和自然经济不稳定、缓慢的生活习惯所产生的长袍宽袖的服装形式，给新的生活带来不便，促使服装款式向短装要求发展。另一方面每个民族总希望自己强盛起来，而强盛就不能闭关自守。非得要吸收其他民族的长处，这就是构成民族间相互交融的心理。随着新思想的发展，新观念的建立，人们对服饰的要求并不满足传统形式的承袭，也不意接受包括西方服装在内的外来服饰，已冲破宗法束缚，由保守转向时髦的追求，反映中国学习西方接受科学民主的整个时代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中山装和旗袍的出现则满足了这些要求。如中山装和旗袍适合人体穿着舒服方便，使用各种场合实用性强，而且经济省钱各种布料均可。

2.2 纯粹的西式装束

自19世纪西式服装开始规模性的进入中国起，到20世纪20年代后引进的西式服装种类相当齐全。在这里主要介绍男士的西装，女士的连衣裙，内衣。

2.2.1 男式西装

可以说男式西式服装就是“西装”，但通常习惯说“西装”特指成套的、大翻领的、单排或者双排扣、需要配合领带、有手巾袋和贴袋并收腰的上装或者套装。完整的西装还应该包括西裤、衬衣、礼帽、皮鞋等。西装早在鸦片战争后就传入了中国，最初很少被人接受。在戊戌时期提倡西式服装时，首先提到的就是“领袖白洁”的西装，但在那封建势力很强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实现。恰逢民国的成立，中国出现了大变革，面临“剪发易服”的形势，西装成为破旧立新的首选。孙中山发出号召了：“去辫之后，于易服。”^[60]其后又指出变革的理由：“合古今中外而变通之，其唯改易西装，以进于大同矣。既有西装之形势，斯不能不有所感触，进而讲求西装之精神。”^[61]于是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令条文，其中包括一批关于服饰礼仪的法令，新法令几乎把西式服装作为礼服的样板，规定男子礼服分大礼服与常礼服，大礼服均用西装，常礼服或西装或中式的长袍马褂。对男礼服的式样、颜色、用料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大礼服用西式前短后长料用黑色素宁绸或呢，通常礼服用西式长过膝五寸料用黑色素宁绸或呢，大礼帽用西式高平顶料用黑色缎，等等一些规定。在政府公布了服制条例，提倡西式服装的情况下，西装受到很大的欢迎。以西式服装为礼服，西装的地位更高了，在上层社会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事实上，西装业已成为一种流行的“官服”，正式的交际服装。在当时，“革命巨子，多

从海外归来，衣冠革履，呢服羽衣，已成惯常；喜用外货，亦不足异。无如政界个人、互相效法，以为非此不侧身新人物之列。”^[62]到了20年代城市里穿西装的男子很多，但主要集中在年轻人的身上，主要是学校的学生，洋行的小职员，政府的办公人员。到了三、四十年代西装不断的发展，“事变愈速，服装屡易，都市少年，喜著西装。”^[63]

2.2.2 连衣裙

在西式服装里西装是男士普遍的西式服装，而女士们则对连衣裙这个极具代表性的舶来品，接受较广。30年代里普遍流行起来，“从20年代就有一部分学生，及文艺界，知识界人士穿着，到30年代穿者渐多”。“当时年轻姑娘只在夏天服用，天凉就不穿了，其特点是上衣和下裙相连，腰间紧缩，在腰间加带线可束腰带，能够显出腰身的纤细。但至天凉，因需加夹衣棉衣，就失去了这种显示细腰的特点。连衣裙多为直开襟，又开在前面的，也有开在后面的。袖子长袖和中长袖有袖头，短袖者为平袖，也有做泡泡袖的，喇叭袖的。领有长方领，方领，尖领，胡蝶领等下裙有做宽波式如斜裙，喇叭裙有做褶皱的，其中社会上层的女士和电影明星最为入时，一般市民则较朴素。”^[64]

2.2.3 西式内衣

女士的西式装束进入中国是女性服饰变革的前锋，必然导向服装设计的三围曲线设计，进而摒弃束胸的旧习惯。中国古代女性内衣一般穿肚兜、抹胸或抹腹，“单夹不一，其形象盾，只一副，背后以带结之。”^[65]至清末流行小马甲，胸前密密扣紧。近代性学专家张竞生就公然反对，认为束胸有碍卫生健康，一些开明之士也颇以为然。小马甲虽未放弃，但舆论倾向已不赞成束胸。其后由于一些电影明星和现代职业妇女的倡导，女性也就以西式内衣代替了传统内衣。在这间许多报刊也大做文章，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北洋画报》，该刊以“西妇内衣之沿革”“西妇内衣之一斑”等为题介绍胸衣，内裤，吊袜带等西式内衣，宣传“西洋女子束胸而不压胸”^[66]又称“科学昌明，即内衣亦以橡皮料为主，取其宽紧如意也。”^[67]

2.3 时装的传播媒介

早在中国古代就有所谓“时世妆”，乾隆在他的乐府诗中提到“城中好高髻，乡间一尺长。元和亦有时世装，因之流行遍四方，不为怡容为威态。”^[68]但是这种古代流行的时髦服饰，和近代意义上的“时装”是完全不同的。它每时每刻都在变迁，每时每刻都在发展，具有较大的流动性，而且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身份、地位、职业和财

力等因素做出选择。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服饰上新的转折。时装的出现是在民国时期，它的流行不是偶然的。其一，在封建社会由于等级森严，人们的穿着受到《礼制》的严格规范，衣冠服饰特别是礼服往往代表着一定的身份和地位，上自冠帽，下及鞋履，各有等差，不能随意变动，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到了近代则完全不同，随着封建王朝的灭亡，传统的服饰也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而退出了历史舞台，为人们选择服饰提供了自由灵活的空间。其二，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一种受欢迎的新款式服装出现后，大批量的生产成为可能。时装的流行和传播，除了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因素之外，和民国时期媒体的传播也有密切的关系。当时不少报刊都辟有服饰专栏而且刊登画家设计的各种新式服装，及时传播服饰信息；深入百姓生活的月份牌上的都市女郎身穿各种时髦的服饰；各大百货公司、服装公司及纺织公司，则不断举办服装展演。电影业的繁荣，更为服饰的流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3.1 报刊中的时装

20世纪20年代自《上海时报》增发图画周刊，美术家但杜宇逐期在周刊上发表新装图说，向人们灌输美学和服饰有关新知识。以后各大报纸、杂志也都先后开辟“服装专栏”，介绍各种新式服装，有的登载大量的服装广告，促销和导购服饰，还有的请画家为其设计服装。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时装的产生与流行。

《时报》从1920年起该刊增加了《图画周刊》，但杜宇、陈映霞等人以《图画周刊》为园地发表了大量的“图案画”“时装画”，其中较为出名的有“海上之新装束”、“留美女学生之新装束”等。“但杜宇认为留美女学生接触西方文化较多，因而能够融汇中西之优点，因而对于衣服改良极有研究”。^[69]《良友》还介绍许多海外的服饰流行：该杂志1926年第16期的《几种女足的装饰》就介绍了很多欧美女鞋的时尚样式；1927年第13期的《美国女子体育服饰由繁到简之变化》一文介绍美国女子运动装的简化过程。《美术生活》、《北洋画报》《申报图画周刊》等等刊物也都通过图片、图画介绍服饰。

各种服装商业广告也起到传播时装的作用。以1926年12月16日和18日出版的《申报衣服号》和《申报修饰号》增刊为例，因为这是历年以来上海报刊行业编辑出版的规模最大的服饰专刊，各大服装公司及相关企业纷纷把握时机，刊登大幅广告，计有：“美亚丝绸总厂（1/2版面）、上海抛球场乾发源皮货局（1/2版面）、绮华公司上海首创妇女用品专门商店（1/4版面）、南京路抛球场口天发祥皮货局（1/2版面）、上海老九纶

绸缎局（1/4 版面）、先施公司（1/4 版面）、西比利亚首饰公司（1/8 版面）、上海大陆大药房（化妆品，1/8 版面）、上海永和实业公司（化妆品，1/8 版面）等。^[70]

在近代中国没有专业的服装设计师，设计服装的任务也就由画家完成。所以当时有许多画家在《良友》、《永安月刊》等杂志上开辟专栏，专门设计或描写上海的流行服饰。叶浅予、李珊菲、张乐平、方雪鹑、梁白波和万家四兄弟等画家都曾以自己的画笔向大众引介西方服装。叶浅予 1927 年 10 月《上海画报》提供一款《秋之新装》就是款西式大衣；李珊菲 20 年代设计的改良旗袍和西式大衣，款式就很新潮；还有万氏美术摄影室的《绣在儿童衣服上之卡通图案》全是米老鼠等迪斯尼动物明星形象。画家们对于时尚的作用并非只是一种单纯的引介，还带有创造性的设计，他们将原型做了相应的变化，注入了新鲜、时尚和富有个性的内容而达成了一种升华。例如叶浅予在 1928 年 10 月为《良友》杂志所设计的，是若干款冬季女性服装样稿，一般是内穿旗袍，外罩各式大衣或斗篷。当时旗袍的下摆正有一个逐渐上移的趋势，这一点在画家的画稿中被反映出来。另一位画家万籁鸣在 1928 年 8 月为《良友》杂志所设计的，是若干款新式旗袍样稿。当时西洋盛行短裙，中国女性服装因此而受到影响，从 1927 年起，旗袍下摆不断被提高，到 1930 年，旗袍下摆几乎与膝盖齐平，袖口也逐渐缩短。万籁鸣的这一组设计，正是对这一趋势的推动和反映。画中女性所穿的旗袍，高领、收腰，兼有中国传统服饰的典雅和欧美流行服饰展示女性身体特征的优点，配以高跟皮鞋以及披风、围巾等饰物，极富美感，果然在第二年就成为了流行样式。

2.3.2 月份牌中的时装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在开埠城市上海还出现了一种近代商业特有的广告形式——月份牌。它最早是外商致力于洋货倾销而雇佣本土画家结合西洋画技法绘制的一种广告宣传海报，它们大多采用商品海报的样式，或被制成印有公司名称的艺术画片。而在内容上则以各色西洋名画、西洋美女和西方历史上的名人为主，但却很难为中国的老百姓所理解和接受，其广告宣传的作用自然是微乎其微。于是一些精明的商家开始考虑洋广告画的中国化问题，试图找到一种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新形式。其后这一广告形式与中国的传统年画、历书相结合，有了中西合璧的制作手法，在内容上采用了人们更加喜闻乐见的民间传说、古典故事为主要题材，由商家印制，免费赠送。月份牌以其装饰性和实用性颇受时人欢迎。从 1896 年，第一张正式标明“月份牌”字样的《沪城开

彩图》由上海鸿福来彩票行随彩票卖出时附送开始,其一发而不可收拾,逐渐成为上海家家户户必有的装饰品。到了20世纪初随着西方经济在上海的逐步渗透,西方的现代广告理念便借鉴了月份牌这一广告模式,引入了时髦女郎这一审美符号,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在上海滩风靡一时。月份牌广告画以应时的美女和时装为主要题材,它的出现一方面使得广告完成了向社会商业化现代化的转变,而时髦女郎以时髦的衣饰、新颖的着装成了那个时期的流行风向标,很多地方的人就是通过月份牌中的人物穿着打扮、服饰发型,知道那时的流行,并以此效仿。可以说月份牌在传递商品和时尚信息方面真是功不可没。月份牌广告画风靡了那个年代,是对民国年时期生活、时髦心理最准确、最典型的历史写照。

在20世纪20年代时期,社会风气开化,有关女性的传统观念更新,女性的社会角色在发生变化,女性在媒体上的形象逐渐增多,时髦美女频频在报纸广告中亮相成为社会一种美的符号,在多变的社会时尚中成为一种永恒的主题。而月份牌则把这一时尚的主题和时装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在其兴盛的短短20年里,以这种广告形式介绍的女性流行的时装,体现女性的美丽,“衣饰以身长玉立为美的人物为模特,身着当时妇女流行的各式服装装扮,从清末衫袄裙装、20世纪20年代的旗袍到新潮的西式洋装打扮,无不烘托出主人公身材比例修长飘逸之美”^[7]可见月份牌是当时社会女性服饰的缩影。其中衣裙等款式设计的变化是女性服装设计改革的特色。从20年代到40年代,月份牌上的女装经历了从“文明新装”到旗袍和西式服装的过程。20年代月份牌画家郑曼陀成为月份牌绘画坛的盟主。“五四”运动前后,在科学、民主思想的影响下知识女性渐渐成为一种时髦。郑曼陀抓住这一人们热衷的社会现象,将知识女性作为描摹的对象,一般是以清纯的女学生身着短小的上衣下裙为主,造型上突出女性曲线美,上衣修身,缩短的袖子露出圆润的小臂,下摆的抬高露出丝袜、尖头高跟鞋,衣领降低高度,让颈项露出来。裙子不断简化,原来裙摆繁琐的花边、绣花等装饰逐渐演变为无褶。这一形象是时尚佼佼者。这时的月份牌上除了上衣下裙的服饰外,还出现了旗袍。到30,40年代月份牌和旗袍同时盛行的时期,又以各色旗袍为主。月份牌画中的女性多以当时的电影明星如胡蝶、阮玲玉、杨耐梅等为模特。全新包装的时尚美女使看惯了《点石斋画报》中都市仕女形象的读者耳目为之一新。月份牌中的女性用最时髦的物品:电话、收音机、唱片;最时髦的消遣:打高尔夫、骑马、游泳。旗袍与月份牌同步前进,月份牌使旗袍成为当令新装。其中从30年代起月份牌中出现了许多西方的服装款式,如婚纱、运动衣等。这

也说明了月份牌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广告画,它同时也是一个展示社会风情的舞台,引领社会时尚的标志。

月份牌广告画以应时的美女和时装为主要题材,在传递服饰信息和时尚信息方面真是功不可没。月份牌广告画风靡了那个年代,是对民国年代上海滩的民众生活、时髦心理最准确、最典型的历史写照。

2.3.3 电影中的时装

到了 20 世纪,随着电影的普及,电影明星成为大众的偶像,穿着打扮越来越受到大众的注意,对于引导时尚有很大的号召力,起初是外国明星,主要是好莱坞明星,向时髦女性传输了许多新的服装概念,时髦女性开始追求翻翘的睫毛,以深色眼影画出幽深的眼眶,烫发也可以被视为女性对欧美时尚的追逐而得到认同。然后当中国有了自己的电影明星时,如胡蝶、阮玲玉、杨耐梅、陈燕燕、黄柳霜等明星,当一般女性还穿大袖袄、马面裙的时候明星们已经都换上了造型西化的连衣裙。她们的穿着打扮沿用或吸收了很多西洋服装特点,并且更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她们便成为新的服装主流引导者。银幕上的“电影明星也带动着时尚的潮流,各大电影公司都雇有专门的服装专家,为影片中的女主角设计新颖别致的旗袍。”^[72]胡蝶的银幕形象和留存下来的照片,多数是西式打扮。生活中她曾多次参加服装展览会,所展示的服装,从连衣裙到晚礼服都非常贴切地演示了 30 年代上海服饰潮流上的中西合璧,也使得上海妇女多以跟随这种潮流为时髦。

第3章 民国城市服饰西“服”东渐的内涵

3.1 民国城市服饰西“服”东渐的原因

3.1.1 内部原因

1. 政治原因

服饰变革是长期政治影响的结果,同时又是短期内政治思想社会化的产物。可以说服饰的发展自古以来就与社会政治是紧密相连的。我国自秦汉以来直至宋明前男子束发于顶,身着宽袖袍服,虽色彩、服制代有变异,但其基本特色和实质则是代代相沿。清朝建立以后,“清代的剃发更为严厉,连金元时代特赐例外的孔府也一律剃发易衣冠。”^[73]清朝废除了中原的原有服饰,强迫汉人穿满人的服装,强迫剃发辫,借以消除汉族的民族思想。满族擅长骑射、故服装为圆领窄袖,因此代替了明朝的服装。清王朝强迫改革服制,从发型到穿衣都有严格的规定,例如“京城内外限口,尽行剃度”。若有“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后来在“十从十不从”的法令下,满汉矛盾才逐渐趋于缓和。“十从十不从”法令包括: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不从;老从少不从;儒从而释道不从;娼从而优伶不从;仕宦从而婚姻不从;国号从而官号不从;役税从而语言文字不从。^[74]

到了近代,服饰作为社会发展最直观的表演舞台在自身的变化中,印证着近代政治生活的变迁,体现着革命洪流的冲击。19世纪90年代,民族危机深重,革命思想洪流涌动,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为服饰变革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变衣冠而启民智”,自维新以来即被先进知识分子重视。1896年在《时务报》上,梁启超发表了他著名的《戒缠足会叙》一文,集中阐发了他的戒缠足思想,他指出:“岁狱吏之尊,无此忍心,即九世之仇,亦报不至是。顾乃以骨肉之爱,天性之亲,徇彼俗情,为此荼毒,呜呼!可不谓愚人哉?可不谓忍人哉?”^[75]康有为在《戊戌奏稿·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指出:“今为机器之世,多机器则强,少机器则弱,……然以数千年一统儒缓之中国褰衣博带,长裙雅步而施之万国竞争之世,……诚非所易矣。”他认为辫发长垂,不利于机器生产;宽衣博带、长裙雅步不便于同万国竞争,因而请求“放足、断发、易服”以便与“欧美同俗”。康有为立足于世界发展大趋势,陈述传统服饰与当时社会进步发展之间格格不入,并把服饰改革提到了利于国家强盛这样一个高度。他要求皇帝作为表率,“身先断发易服,诏天下

同时断发，与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其小民一听其便，则举国尚武之风，跃跃欲振，更新之气，光彻大新。”^[76]以期在全国范围内出现更新之气，光彻大新。虽然百日维新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服制改革没有以政府诏令的形式在全国推行，但是根据一份当时的《奏定学堂章程》奏折记载，“近年来，各省学堂冠服一端，率皆效仿西式，短衣皮靴，文武无别”，^[77]服饰的西洋化，已初露端倪。而后，大量留欧美和留日青年学生，在国外掀起了“剪辫易服”风潮。清外交大臣伍廷芳亦从“俾免歧视”追求与世界平等的认识，提出“剪辫易服”，并明确提出“改易西装”奏议，以便与时代潮流接轨，提高民族自尊。^[78]（P98）孙中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仅在政治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服饰习惯。他通过其革命的实践和对世界潮流的考察，对服饰改革的重要性的认识要比康有为等维新派深刻、强烈而又系统，而在服饰的实践中的表现则更加大胆、热情而坚定。早在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小团体。兴中会之际，他在《兴中会宣言》里就已明确指出：中国服饰的落后，就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落后，服饰的被轻视，实质上就是中华民族与中国的被轻视。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革命，从而将服饰改革与政治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79]（P99）民国成立就发出“剪辫通令”，还颁布了《服制条例》明令禁止蓄辫、缠足、易服。孙中山在制定新的服饰中提出了服装制作原则：“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服装摆脱了等级制度和政治、伦理的干预，促使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衣冠之治的瓦解。这些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观念为服饰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在临时政府参议院颁布了男女礼服的服制后，因人的服饰习惯在短时期内很难改变，服制条例在民国初年未得到实行。但政府的强制介入，将新服饰引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新的服饰习惯和审美观念又会逐渐形成。

在传统服饰与近现代生活相矛盾的黑暗时代，政治革命这个伟大的勇士为它带来了曙光。它否定了传统的“分等级、判尊卑”的服饰制度，打破了传统服饰单调、禁锢的色彩，并把西方服饰引入中国广泛传播，使现代的服饰与生活相接轨，同时也促进了西服东渐和中西融合。可见服饰的变革与革命是互动的，是紧密相连的。社会革命带动了服饰革命的发生，反过来，服饰革命又推动了社会革命向纵深发展。

2. 经济因素

民国时期西服东渐的经济学因素则在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瓦解和西方殖民经济的渗透和进入。虽然民国时期我国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但是由于封建统治者

长期推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的因素,中国经济长期处于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状态,在服饰的需求上也是如此。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商品倾销的市场,西“服”东渐就是在西方经济向东方渗透的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到民国时期,大批的西式布料(如毛呢)和西式服饰进入中国,“辛亥革命以后在武昌一地,因改穿西式服装而输出白银就有2000多万两;天津在1912年春,一个季度进口洋服、洋帽输出白银达125万两”。^[80]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西式服饰和布料向中国的倾销和渗透是相当大的。这是民国时期西“服”东渐原因之一。

而另一方面成衣业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商业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由于民国时期服装材料、剪裁、传播方面的发展以及西方先进科技工艺的大量引进,使民国时期成衣业有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由于所在地域不同,所处阶层不同,国人对西式服饰的需求也是多样繁杂的,众多的店面见证了当时西式服饰成衣业的繁荣。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的女子成衣铺和服装公司为例,著名的就有20多家。如图表:

店名	经营特色	店址
金泰时装公司		静安寺路955号
美美公司	时装, 首饰	静安寺路288号
景艺时装公司	女式裁缝	静安寺路879号
鸿翔公司	女式裁缝	静安寺路863号
上海时装公司	女式时装	同孚路349号
永泰号		同孚路323号
金泰记	女式裁缝	同孚路301号
康记	时装绣花	同孚路312号
惠麟	女士时装	同孚路30号
华艺时装公司		同孚路309号
隆泰	女式裁缝	同孚路291号
卢伟记	女士内衣	同孚路368号
百合女衣店	女式时装	霞飞路917号
莫乃克		霞飞路810号
美国女帽公司	女帽制造	西宁路20-40号
爱伦辉洋行	花边, 绣品, 男女服饰	西宁路813号
罗茜艺术时装公司	时装	西宁路813号
大新	女帽	四川路487号
仁义女子服装公司	女装	大西路809号
明星时装公司	女子时装	福州路744号
翻新那时装公司	女子时装	福州路514号
恒丰协绸缎呢绒服装公司		汉口路540号
康盈洋行有限公司	女式裁缝	圆明园路133号
集美公司	女式紧身衣	中央路7号
竭格斯	女帽, 皮货, 时装	江西路170号

^[81]随着成衣业的发展，人们对西式服装趋之若鹜，19世纪穿着洋装尚是凤毛麟角，到20世纪初广西梧州中学已经容许学生“披洋装揖孔孟”。^[82]轻便、合体的洋服逐步赢得中国人的欢心。

3. 思想文化因素

西式的成衣业迅速发展并受到普遍的欢迎，这与城市民众在服饰变革后观念更新、追逐时尚不无关系。男剪发女放足后，需要与之配套服饰出现，但那时还没有合适的中式服饰的出现，于是人们把目光放到了西“服”上，出现了“去辫之后，亟于易服，由急切不能得一适当之服式以需应之，于是争购呢绒，竞从西制，致使外货畅销，内货阻滞”^[83]的现象，使各种西洋货充斥中国市场，西化服饰思想的广泛传播。人们沉浸在西式服饰及其所代表的文明海洋中，是否穿着或者接受西“服”成为一个人文明开化的标志。有的人认为“西装之精神在于发奋焯厉，雄武刚健，有独立之气象，去奴隶之根性，穿了它可振工艺，可善外交，可以强兵强种”。^[84]言语虽然过分夸张西装，但从中可见当时人们对西服的偏爱。《时报》中一则名为《新国民小传》的顺口溜中说：“有一位新国民，戴一顶自由帽，穿一套文明装，着一双进步靴，走过了交通路，来到了模范街，踏进了公益会，说几句义务话”，十分生动地勾画出了民国服饰的西化。还有人讽刺西服：“洋帽洋衣洋式样，短胡两撇口边开，平生第一伤心事，碧眼生成学不来”，“现代中国的摩登姑娘、太太们，哪一个不是成了洋货商店的好主顾，从头发丝尖儿起，至高跟皮鞋底的最末一英寸止，差不多除了她们固有的中华血统的皮肉之外，全都装饰着舶来的服用品……”^[85]但是从侧面我们仍可以看出西“服”在人们生活中的流行。

文化的传播也是西服东渐的原因之一，首先是报刊，民国时期各个报纸、杂志都辟有服装专栏，介绍新式服装。如《北洋画报》、《永安月刊》、《上海生活》、《良友》等，他们是介绍西式服饰的窗口。如《良友》画报不定期地刊登国际流行时装发布会的消息，其主要通过摄影图片和文字来报道巴黎、伦敦和纽约等各个时装中心的时尚动态，如《良友》总第60期发表的“欧美流行夏季时装”，以两幅版面介绍当季的连衣裙、套裙等，并配有说明：“领缘皮袖口与黑色反映成趣，额前罩以半截面网，为巴黎流行新装”。其次是电影和电影明星。当电影普及以后，银幕上的电影明星的穿着打扮成为大众模仿的对象。起初是外国明星，主要是好莱坞明星，向上海的时髦女性传输了许多新的服装概念；然后当中国有了自己的电影明星时，因为她们的穿着打扮沿用或吸收了很多西洋服装特点，并且更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她们便成为了新的服装主流引导者。最后是

服装展示,一些大的百货公司、服装公司为了促销自己的产品,纷纷举行服装展览会,将时尚推向了新的高潮。报“本埠惠罗举行春夏时装展览会,轰动一时,分中西两部,由少女往来于来宾之前,以资观赏;”“天津妇女界慈善游艺会之压轴时装表演屡在西湖饭店排练,姿态步伐,俱臻美妙,闻此等时装,悉由参加者别出心裁,故式样皆新奇,匠心别具”,“北平妇女团体主办之游艺会时装表演在北京饭店举行,来宾达千余人,参加表演者多为平市名闺秀”。^[86]

3.1.2 外部原因

费正清在《剑桥中华民国史》里说道:“只要把1912—1949年间的中华民国与此前的晚清以及此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一比较,人们就会看到这些年里外国人的影响、甚至参与中国生活的程度是何等的深刻。”^[87]工业革命促使西方国家科技文明飞跃发展,推动了其社会经济、技术的迅速发展,使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极大丰富。资本主义国家视开拓海外市场为当务之急,对外进行殖民扩张,简单合体的西服便是这一过程的产物。传播西“服”的媒介第一是租借地。侵略者在其租借范围内依照其宗主国的风俗习惯改造了租借的地貌。改造包括吃穿住用行生活的各个方面,“住洋房,用电话、电灯、电扇、自来水等,居住文化发生了变化;西药、洋伞、纸烟、钟表、眼镜……舶来品大受民众欢迎;舞会、扑克、电影等西式娱乐方式为上流社会所接受;城市饭店、西餐等馆相继出现;汽车、人力车取代轿子,交通工具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服饰上,羽纱、呢绒、绸缎、哗叽、蕾丝等洋纱、洋布倾销中国市场;皮鞋、高跟鞋、化妆品、附饰物等也蜂拥而至。”^[88]最初受雇于西方人的买办、工匠和水手等人首先与外来文化进行了面对面的直接接触,这当然包括西方服饰文化,而后越来越多的人也逐渐接触了西方服饰文化。第二,西文报刊。在中国著名的西文报纸有《New year, New shoes, New prices》《Clothes for New year》,服装与服饰广告是它常见而重要的内容之一。《Modes of the moment》《Divertive Top-ics for Wonman and Home》的服饰专栏,内有款式图和文字评述。《The shanghai sunning times》的增刊,服饰更是头版的主要内容。^[89] (P14) 这些报刊的读者大部分不是外国人,而是一些深通西文的女大学生、贵妇等等。第三,教会学校和专门的服装学校。在教会学校里教师大部分是外国人,他们的服饰和生活习惯使中国的学生耳濡目染。如“圣玛丽娅女中学的女学生1920年还穿高领大袖袄,到了1940年开始穿西装、西式衬衣与绒线编制服装了。”^[90] (P15) 专门的服装学校一般也是由外国人授课,

广告词打的也是“法国装束美专家创办时装剪裁学校”主要是教授西式的服装设计和剪裁之法。学习这些的主要是专门的裁缝和家庭妇女，这对于西服的传播具有深远的影响。综上所述可以说西方的异质文化、思想输入改变了人们的着装观念，西方的物质生活对近代中国生活方式西化的驱动可以说是全方位的。

3.2 民国时期西服东渐的特点

3.2.1 不均衡性

民国时期服饰并不是呈线性均一的发展状态，在“东渐”的过程中，由于诸多原因呈现出不均衡的渐进状态。

城市之间的不均衡：西“服”东渐在各个城市间的发展和传播的程度及速度是不一样的，呈现出一种发展很不均衡的趋势，如沿海与内地之间、南部城市，北部城市与西部城市之间、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经济商业城市和政治型城市之间。那么以代表东南沿海的经济商业型的大城市上海和代表北方的政治型大城市北京为例，相比较便能看出民国时期服饰发展的不均衡性。中国自古流行的服饰来自于京城，所谓“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91]可以说京城一直是时尚的中心地带，全国往往以京城的流行服饰马首是瞻。但是到清末以后，北京作为时髦中心的地位被取代了。“在清末上海已成为女子服饰的潮流中心，民初则步入摩登时代。北京步其后尘，而西部的反映则是细波微澜，较之于北京至少落后十年。在上海最先与洋装打个照面，并行不悖时，京城女性的穿着依然严守规范，不越雷池半步。”^[92]作为后起之秀的上海成为全国流行时尚的中心。在上海，服饰超越了国界，各种华丽纷繁、新颖时尚的服饰聚集在这里，成为新潮装扮的发源地，成了其他地方羡慕和仿效的对象，左右全国的流行趋势，即使南京、苏州、北平等大城市也唯其马首是瞻。“他处尤而效之，致有海式之目”“同光之交，上海青楼之服饰，岁易新式，靓妆倩服，悉随时尚……而风尚所趋，良家妇女，无不尤而效之。未几，且及于内地矣。”“妇女衣服，好时髦者，每追踪于上海式样”。^[93]同时服饰变化日新月异，稍不留神就落伍了，“人人都学上海样，学来学去学不像，等到学了三分像，上海又变新花样”。“装饰的变化日新月异，几年之间，已不知变化了多少次”。^[94]

民国的北京和上海之所以出现不均衡现象其原因在于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地理文化的差异。“趋新风尚往往建立在物质生活环境变化基础之上”，^[95]上海

位于坦荡低平的长江三角洲平原,东濒东海,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加之元以后经济中心转向江浙,使得上海较早有了良好的经济基础,鸦片战争之后成为最早的通商口岸和最早的租界。随后引来了西方文化和外国资本的蜂拥而入,民族工商业的形成壮大,市政交通的发展完善。特殊的地理位置、商业功能和社会环境,吸引了大量的四方外国和本国的移民实现频繁的中外交流,这个外来人口较多的移民城市的特性决定了上海比中国其他地区较少受到礼教传统的束缚而更多接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原本在中国历朝中最为严格的清代服饰等级制度在上海也日趋松弛。这些使上海人首先放弃了宽大繁缛的中国服饰而穿上了合身、简便、亮丽的西式服装。而同一时期的北京,地理位置不如上海优越,处于内陆地区,交通不是十分便利,经济不是很发达。加之是一直为封建政府统治的所在地,人们受其传统礼教束缚较多,封建思想势力很大又较为顽固,拒绝或者较少接触新事物,所以西方文化很难传播。

城市阶层之间的服饰发展的不均衡:城市中各阶层服饰的变迁的不均衡性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不均衡是由于职业需要、思想状况、文化程度、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的差异所形成不同。其中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是个人的经济状况,它是选择服饰的主要方面。

“从前男子鞋袜,多半制自妇人,即从店家所购,每双不过六七百文。今上海妇女之鞋且须买穿,而西装少年购皮鞋一双,非化六七元不办……”^[96]可见经济决定了个人的服饰购买力。社会的上层政府要员、买办、资本家、洋行老板以西装、中山装、上等布料的长衫等作为日常服饰;中层的小职员、教师、商人、学生则选择中山装和长衫;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小商贩、工人只能穿方便他们工作的对襟短打。城市阶层服饰的另一方面的不均衡是个人服饰与个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发生一种错位,如老舍先生名著《骆驼祥子》中,描述车店主刘四爷准备庆祝自己六十大寿生日的场景。刘四爷为了在众人面前显示自己“体面”的身份,要求自己车行里的伙计,在参加贺寿仪式上一定特别要做到的就是穿长衫。他说:“到了那天(贺日),谁要是短獠獠的进来,别怪我不给面子,把他轰出去!”^[97]还有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他是咸亨酒店唯一一位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人。虽然都是小说的描写但足以看出服饰成为一张可以穿的名片。“在上海,穿时髦衣服比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色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的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进正门。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底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98]这种现象的造成是封建等级制度在人们意识当中的保留和作祟和商业发展造成

的“只重衣衫不重人”的风气。中华民国在法令上废除了沿循数千年之久的服饰等级制度,但在社会心理上这种等级制度依然根深蒂固。加之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传统自然经济解体,带动工业化和农产品趋向商业化,在商业精神支配下的都市中,人们在思想观念上背离传统伦理道德而趋向于现实功利。服饰成为人们向社会展示个人成就、地位和财富的一种手段。

3.2.2 盲目性

民国时期西“服”的东渐也造成了人们对西服追求的一种盲目性。鸦片战争后,西方的坚船利炮和精巧奇异的机器使生活在梦寐中的人大开眼界,逐渐在人们意识里面形成只要“洋”的东西都是很好的。自19世纪末开始,各种外来服饰,如西装、学生装、连衣裙、大衣和各式行业制服开始涌入中国,使得作为这些西方先进文明的象征的西洋服饰,当时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并得以迅速在一些较大城市传播和实施,很快在全社会形成崇洋风潮,席卷中国的城市。可以说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正以史无前例的规模效应影响中国,使短短三十多年的民国文化发展得洋味十足,喧闹异常。“民国初年的时装,大部分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衣领减低了不算,甚至被蠲免了的时候也有。领口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形,金刚钻形。白色丝质围巾四季都能用。白丝袜脚跟上的黑绣花。像虫的行列,蠕蠕爬到腿肚子上。交际花与妓女常常有戴平光眼镜以为美的。舶来品不分皂白地被接受,可见一斑。”^{[99] (P249)}“时髦女式必备品尖顶高底皮鞋一双,紫貂手筒一个,金刚钻石宝石金扣针二三只,白绒绳或皮围巾一条,金丝边新式眼镜一副,弯形牙梳一只,丝巾一方。”^[100]国民政府教育部曾派员视察上海六所大学,报告中指出,“各校学生服饰,大同比较朴素,其余大多数习之奢侈繁华,衣履竞尚新奇”,“日下社会中最繁华奢侈的,莫过于学生,无过与大学生,更无过与大学生中的女学生……受教育程度愈高,需用奢侈的愈多,便是推销洋货愈力……”^[101]盲目的崇拜洋货造成社会上奢靡浪费的风气,而且更为惨痛的是洋货充斥中国市场,使国货门庭冷清、无人问津,我国民族工业一落千丈,造成国货危机。为救国货危亡在不少仁人志士的倡议下,1933年被定为“国货年”,1934年、1935年又相继被定为“妇女国货年”和“学生国货年”。然“国货年之提倡,系一种兴奋剂……只有刺激性,而无根本治疗之力也”。但是国货年作用还不是很大,它无力阻止崇洋风气的继续发展。时人总结其时的经济状况时说,“1934年的中国经济,是继续着1933年的衰落,而更加深化的一年”,“不论农业、工

业、商业都显示了极度的衰落……如棉纺织等，均已山穷水尽……”^[102]盲目的崇洋虽然不至于把国民经济推向无底的深渊，但也是促使经济衰落的因素之一。

3.2.3 兼容性

到辛亥革命后，西式服装的设计更贴近现代生活了，造型由宽变窄，由长装转化为短装，穿着方便、款式多变，花色品种也很多，西式服装以它全新的审美情趣赢得更多中国人的青睐。加之当时国民政府和伟人孙中山的提倡，穿西服人数在民国是不断的增多了，掀起了一场服装改革浪潮。但是有千年传统的中国服装依然在人们心目中的有着不可抹没的地位。长衫，马褂或马甲等中式服装依然可见，一些喜爱传统服饰的人在家穿长袍，有时外套一件小坎肩，出客添换马褂以示郑重，脚上仍是布袜、布鞋。民国初期是中西服饰混合杂处的时代。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中西两种服饰文化已经不存在并行不悖的现象了。在不断接触中出现了服饰上的“中西的合璧”，也就在生活中把属于中式和西式的衣服相互交融，重新组合。这种合璧是两个方面的合璧，一方面是中西服饰相结合同时穿，在男装上的反映是从20年代开始，渐渐在教育界和知识界形成并流行起一种把中国方式和西方方式结合起来“中西和璧”的穿着方式，即下边穿西式长裤，皮鞋，外罩长衫，头戴圆檐礼帽。秋冬戴长围巾。这大概也可以算是长袍的一种特殊的变化。女装则是旗袍与西式服装的搭配旗袍外穿西式外套，大衣和绒线衫，毛线背心并缠上围巾作装饰，再配上流行的烫发和丝袜、高跟鞋是当时最流行的搭配。中西搭配不再显得不伦不类，而是交相辉映，更有一种独到的韵味。另一种合璧便是中西服饰的融合，人们在服饰经历一段“崇洋”以后，在政府和社会精英的倡导下，着装心态逐渐趋于理性，开始追求穿着舒适、美观，并合适国情的服饰。于是善于取长补短的国人在结合本民族特点的基础上创造出国服中山装和旗袍。中山装与这些新式服装与式样烦琐、穿着不便的西装相比，优点就是实用方便，经济。而旗袍它采用西式裁剪方法，使其更适体，更简洁，富有现代美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东方女性的曲线美，衬托出典雅含蓄的东方神韵。

3.3 民国时期西服东渐的意义

3.3.1 衣冠之治解体，服饰向平等化、现代化发展

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的“衣冠之治”制度解体，服饰的阶层、服饰趋向平等化、现代化发展。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服饰不仅仅是用以遮体、防寒暑的工具，更是与“礼”

相联结的治国之本，尊卑贵贱的等级序列的标志。它最显著、最充分地体现人们的身份地位。历朝历代都以“会典”、“律例”、“典章”等各种条文颁布律令，规范和管理各个阶层的穿衣戴帽，从服装的质料、色彩、花纹和款式都有详尽的规定，严格的区分君臣士庶服装的差别，违者要处以重罚。“夫礼服之兴也，所以报功章德，遵礼让贤。故礼尊贵，不得相逾，所以为礼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顺则上下有序，德薄者退，德盛者缙。故圣人处乎天子之位，服玉藻遽延……所以副其德，章其功也。”^[103]清朝皇族宗室的长袍要开四衩，官吏士庶开两衩，平民百姓则不开衩，俗称“一裹圆”。另外，皇室官宦的开衩长袍上必须装有箭袖，因形状似马蹄，又俗称“马蹄袖”，平时挽起，行礼时甩下。这既体现了满族惯于骑射的特点，同时也意在督促臣民争为朝廷效犬马之劳。这些规定严格体现社会成员之间的君臣庶民、尊卑长幼的关系，以达到社会的“顺礼”、“有序”，进而达到“天下大治”，此即“衣冠之治”。这样造成了中国服饰发展的单一化。这一森严制度是与中国封建制度相伴相生的，即使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有所动摇，但并未触及其根基。直到辛亥革命胜利后，封建制度瓦解了，代表“严内外，辨亲疏”的服制也随之没了踪影，人们的穿衣摆脱了几千年的束缚，终于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穿衣打扮。到了五四时期，人们受西方思潮的影响殊深，越来越多地醉心于西方物质文明和西方的精神文明，西式服装也越来越多活跃在民国社会的大街小巷上，形成了中国传统服饰与西式服装并行不悖、相互补充的局面，中国的服饰更加进入现代化的范畴。这时“时装上显示出空前的天真、轻松、愉悦。”^{[104] (P285)}可以说民国时期的服饰变革不仅仅是社会变革，更是人们在人性上的一次解放。

3.3.2 服饰观念融合中西，向个性化和多元化发展

“西风”的吹进，传统的审美观念改变了，融合中西的服饰观念开始形成，服饰开始向个性化和多元化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受传统封建文化的影响，人们的着装更多地表现为含蓄、端庄、严谨和大气，以宽松的“无形之形”的服装遮住人体，设计不合人体完全是简单平面化，不讲求精确，以包藏为美。女性作为封建社会一个必不可少的从属群体，传统的伦理规范已深深的沁透在她们的一衣一衫之中。从变形的小脚到扁平的前胸，从僵直的姿态到平直的体态。“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罢了”。^{[105] (P286)}臃肿、肥大的衣衫如同森严的封建礼教一样将女性的躯体紧紧的遮蔽起来。穿着镶着三滚五滚的花

边、刺着腊梅海棠的裙袄,把脚缠成三寸,然后套上里里外外绣了金线银线、牡丹芍药的绣鞋,在围了七层八层的大宅院里安心地作花瓶。^[106]正如张爱玲所说“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触目代表了个性的张扬、放荡的表现,这是与封建的审美标准相对立,更确切的说是与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与伦理法则是格格不入的。而西方服饰却恰恰相反,其设计风格讲求比例、匀称、和谐的整体意识,追求人性美、人体美,西方人特别是西方女子的服饰文化更讲究人体曲线美的表达”。^[107]曾有人对西方女子的装束有过这样的感慨:“素练重裙着地飘,轻纱障面避尘嚣”。“飙车怒马,几于声轰雷而影闪电。素衣霓裳,风飘欲举,见者怀天仙人乘碧落而来红尘也。”^{[108] (P78)}这种视觉感受犹如在天堂,让人们不得不开始欣赏西方女子整体服饰之美。受西方影响,20世纪初中国的服饰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人们越来越钟情于紧窄、适体、简便适应现代生活而且还能体现个性美、曲线美的服饰。中西融合的服饰观念开始萌芽并迅速发展,在伟人和大众的智慧下产生了产生中西合璧的旗袍与中山装。旗袍的裁剪为西式立体式,相较传统服饰更为适体,美观简便,更有助于突出女性的曲线美和东方女性的典雅神韵。中山装适体、实用、展现现代男子的精神风貌。

随着封建制度的灭亡,传统的审美标准改变,服饰由过去等级贵贱的标识逐渐淡化为表现个人自己的审美、情趣爱好、经济水平为标准选择服饰,而且不同阶层的人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各异,服饰呈现出多元化和特性化特点。其表现为服装选择的多样性和个别性,民国时期服饰信息传播加快,都市里无论男女竞相逐求时髦。这一时期人们生活热情空前高涨,服饰日新月异,彻底打破了以往服饰变化节奏缓慢、幅度较小、周期性长的局面,更新速度前所未有,尤其是女性服饰。一般受过新思潮教育的女性喜欢朴素典雅;一些职业女性因为职业需要喜欢端庄大方的西式服装;女学生们有机会接受近代化的学校教育一般简朴淡雅。妓女和戏子因为职业需要追求别具一格、标新立异的服饰,成为传递服饰信息的先行者,由于是“女则靓妆倩服效妓家,恬不为怪”^{[109] (P80)}女性在颜色的选择上,女性的厌弃了传统的大红、大紫、碧蓝等色彩而对黑色、灰色、品蓝、暗紫等色彩的开始了青睐。个人消费水平和审美标准是一个侧面,同时依照年龄、身份的不同有明显的区别,如同一种服饰裙子,已婚的少妇以大褶长裙为多见,增其端庄文静感。未婚少女的裙子多露出脚腕,给人以活泼轻盈之感,而劳动的妇女则以使用为主:布头巾、无领布衣、肥裤和“一口钟”。

第4章 结 论

民国时期,我国城市居民的服饰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新旧杂陈、古今共处,到头脚革命、现代文明新装;从中山旗袍,到纯粹西装;从混乱到稳定,我国服饰的演进过程就是两种文明交融、中西合璧历史的一个缩影。通过对这一段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回顾和重新审视,本文略有如下创见:

一、民国初年乃“乱穿衣”之时代。其表现在于:代表不同审美原则的各类服饰杂陈于街头,以至于“西装东装,汉装满装,应有尽有,庞杂不可名状”;不同类的服装杂然于一人之身;追求时髦人士不懂西装搭配,乱穿一气。究其原因,一则封建帝制废除,文明服饰出现,衣冠制度已经荡然无存,剪辮放足成风,人心日渐开化,另有革命者呐喊鼓吹,做思想动员;二则西方文明的侵入,致使习俗渐染、文化熏炙,国人为西式服装所感染,兴趣日增;三则国人传统尚不易改变,另有不习西式服饰者,盲目模仿、东施效颦,惹得“乱”穿衣的笑料百出。故而民国初期,新兴事物方兴未艾,旧有传统死而不僵,以致文明新装一出,风化演易。

二、民国20年始,服饰渐趋稳定,时装媒介大行于世。此间出现了颇具民族特色的旗袍和中山装。旗袍本为满族旗人所穿之长袍。20世纪20年代中期得风气之先,在上海开始流行现代旗袍,及至三四十年代盛行于世,呈“中西合璧、变化多端”之特点,深具民族特色。男装则以中山装为代表。其出现,一为时代转折之反映,帝制已废,新政日出,观念日新,传统服饰必然走向现代;二为国情变化之所需,机器时代之所迫,富国强种之所愿,在此情况下,中山装与旗袍应运而生,甚至出现纯粹的西式装束,如西服、连衣裙、西式内衣等。

三、深刻剖析民国城市服饰西“服”东渐的内涵。文章分析了民国城市服饰西“服”东渐的原因,从内外两方面来把握,指出:社会革命带来了服饰革命的发生,服饰革命又将社会革命推向纵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瓦解和西方殖民经济的渗透和进入是其经济学因素,指出成衣业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商业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西方文化的传播是西服东渐的重要原因;西方殖民侵入,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浸染更迭则是西服东渐的外部因素。在此基础上,西“服”东渐逐渐有了自己的特点:一为不均衡,并非线性均一,而是渐进传递,如城市之不均衡,阶层之间不均衡,如出一辙;二曰盲目性,强

势的西方服饰文化如潮水涌入，国人时有全盘西化者；三曰兼容性，中西服饰杂然并处、并行不悖的时代隐去，而中西合璧的大时代到来，中西服饰或和谐搭配，或日渐融合，直至中山装与旗袍的出现、定型，是为服饰兼容性之绝妙注脚。

在西服东渐的影响下，衣冠制度解体，服饰得到变革，人性得到解放，审美观念发生重要变化。中国的服饰逐渐摆脱旧有观念的束缚，向个性化和多元化发展。

参考文献

- [1] 燕平,程铤.东西方服饰文化交融之我见[J].江西社会科学,2005,(7):191-193.
- [2] 新陈代谢[N].时报,1912-3-5.
- [3] 改良[N].申报,1912-3-20.
- [4] 刘志琴.服饰变迁—非文本的社会思潮史[J].东方文化,2006,(6):4-6.
- [5] 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影印本)[M].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1985.204.
- [6] “闲评”(二)[N].大公报,1912年9月8日.
- [7] 近代上海服饰.http://www.daxtx.cn/?13/viewspace-1013.
- [8]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M].群众出版社,2007-1.
- [9]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568.
- [10] 民国服饰初议会[N].申报,1912-7-15.
- [11] 投诉剪辫[N].中外日报,1900年7月17日.
- [12] 临时政府公报二十九号.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A].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 [13] 胡滨.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4.542.
- [14] 胡滨.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4.548.
- [15] 胡滨.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4.549.
- [16]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A].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 [17] 钱泳.履园丛话[M].中华书局,79-1.256.
- [18]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二十五)[M].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12.
- [19] 左芙蓉.缠足与近代中国妇女解放研究述评[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8).
- [20] 康有为.康有为选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 [21] 内务部咨各省都督禁止缠足文临时政府公报(第45号)[A].1912-3-22.
- [22] 自由谈[N].申报,1912-2-1.
- [23] 苏生文,赵爽.素裙革履学欧风中国近代服饰的变迁(一)[J].文史知识.2008,(3).
- [24] 刘志琴.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8.
- [25] 华梅.中国近现代服装史[M].中国纺织出版社,2008-3.
- [26] 山内智惠美.20世纪汉族服饰文化研究[M].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6.
- [27] 自由谈[N].申报.1911-10-23.
- [28] 事件栏[N].申报.1912-4-15.
- [29] 广告栏[N].申报.1912-3-24.
- [30] 兴丰服装公司广告[N].申报.1911-10-5.

- [31] 山内智惠美.辛亥以后汉族服饰的突变[J].烟台大学学报,1996-4.51-54.
- [32] 最新发明:爱国女帽[N].神州女报月刊,第2期.
- [33] 女子剪发议[N].社会世界,第2期.
- [34] 上海妇女之新装束[N].妇女时报,第1期.
- [35] 上海妇女之新装束[N].妇女时报,第1期.
- [36] 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12.29.
- [37] 论上海女学生的装束[N].妇女时报,第11期.
- [38] 尊文阁诗选[N].申报,1912-3-20
- [39] 论上海女学生之装束[N].女子时报,第11期.
- [40] 街头所见的怪装[N].女子月刊,第五卷,第3期.
- [41] 粤女学生之怪装[N].大公报,1913-6-15.
- [42] 对于女学生之危言[N].妇女时报,第4期.
- [43] 划一女校服饰[N].申报,1913-6-9.
- [44] 李长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一卷)[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3,78.
- [45] 李长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一卷)[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3,80.
- [46] 秃颈之鸦[N].时报,1917-5-18.
- [47] 警界维持风化[N].申报,1917-8-19.
- [48] 取缔妇女之妖袄之呈请[N].时报,1918-5-14.
- [49] 徐轲.清稗类钞(卷91)[M].中华书局出版,1984.
- [50]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三)[M].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 [51] 黄强.变化中的时尚风景—百年女性服饰回眸[J].江海侨声,1999(17).
- [52] 卞向阳.论旗袍的流行起源[J].装饰,2003,(11).
- [53] 女学生的服装问题[N].妇女杂志,1924年10卷4号.
- [54] 包铭新.中国旗袍[M].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1.263.
- [55] 包铭新.中国旗袍[M].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12.101.
- [56] 包铭新.中国旗袍[M].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12.102.
- [57]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M].中华书局,1985,61.
- [58]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M].中华书局,1985,62.
- [59] 尚明轩.孙中山的历程:一个伟人和他的未竟事业[M].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8.
- [60] 孙中山.孙中山文集(第二卷)[M].中华书局,1982.
- [61]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论文选集第一卷下册[M].三联书店,1960.
- [62] 孙中山.复中华国货维持会函.孙中山全集(第2卷)[M].中华书局,1981.
- [63] 王树楠,吴延燮,金毓黻.奉天通志[M].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点校,出版[M].1983-01-01.

- [64] 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装史[M].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07-01: 386.
- [65] 西妇内衣之沿革[N].北洋画报,1927-6.
- [66] 西妇内衣之沿革[N].北洋画报,1927-10.
- [67] 西妇内衣之一斑[N].北洋画报,1928 -3.
- [68] 乐府·时装·敝戎也[EB/OL] <http://www.chinapoesy.com/Other424a55fc-f891-49b8-a16f-765aa75df1fd.html>.
- [69] 留美女学生之新装束[N].时报,1921-1-9.
- [70] 上海档案馆.申报衣服号和申报修饰号增刊[A].1926-12-16日和18日.
- [71] 吴昊,卓伯棠,黄英.都会摩登——月份牌 1910S~1930S[M].三联书店,1994.105.
- [72] 陈晓卿,李继锋,朱乐贤.一个时代的侧影: 中国 1931——1945[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73] 冯尔康.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M].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262-263.
- [74]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M].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53.
- [75]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出版社,1999.
- [76] 金满楼.帝国的凋零: 晚清的最后十年[M].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100.
- [77] <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8046>.
- [78] 张礼恒.从西方到东方——伍廷芳与中国社会的演进[M].商务印书馆,2002-06.120.
- [79]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M].中华书局,1985,98.
- [80]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M].中华书局,1985,99.
- [81] 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12. 125.
- [82] 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
- [83] 周新国.孙中山的服饰改革思想与实践[M].炎黄春秋,2003,(8).
- [84] 蒋雪静.民国西化运动中的女性服饰风尚[J].装饰,1998,(6):17
- [85] 送旧迎新欲继续努力[N].申报.1934-1-1.
- [86] 蒋雪静.民国西化运动中的女性服饰风尚[J].装饰,1998,(6):18.
- [87] 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07.360.
- [88] 徐逸,董薇.浅议民国时期服饰变革的意义[J].宁波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3):39.
- [89] 张竞琼.西服东渐—20世纪中外服装交流史[M].安徽美术出版社,2002-1.14.
- [90] 张竞琼.西服东渐—20世纪中外服装交流史[M].安徽美术出版社,2002-1.15.
- [91] 乐府·时装·敝戎也[EB/OL] <http://www.chinapoesy.com/Other424a55fc-f891-49b8-a16f-765aa75df1fd.html>
- [92] 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 12.64.
- [93] 吕美颐.中国近代女子服饰的变迁[J].史学月刊,1994,(6).
- [94] 吕美颐.中国近代女子服饰的变迁[J].史学月刊,1994,(6).

- [95] 孙燕京.略论晚清北京社会风尚的变化及其特点[J].北京社会科学,2003(4).
- [96] 做上海人安得不穷[N].中报,1912-8-9.
- [97] 老舍.骆驼祥子[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7-1 .34.
- [98] 张胜友, 蒋和欣.中华百年经典散文·吾国吾民(卷) [M].作家出版社,2004-3-1.200.
- [99] 张爱玲.更衣记[M].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10.294.
- [100] 自由谈[N].《申报》.1912-1-6.
- [101] 学生国货年产销应注意学生的需要[N].申报,1934-12-27
- [102] 一九三四年中国经济的总结算[N].申报,1935-1-1.
- [103] 张法.中国服饰：从传统向现代演化的第一次浪潮[J].天津社会科学,1996, (1).
- [104] 张爱玲.更衣记[M].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10.285.
- [105] 张爱玲.更衣记[M].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10.286.
- [106] 刘宁'.中国近代服饰的审美变迁[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4,(2).
- [107] 张爱玲.更衣记[M].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10.290.
- [108] 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12,78.
- [109] 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12,80.

致 谢

论文完成之际，心情万分激动。在此时刻，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肖红松老师、任课老师和答辩组的老师，没有他们的辛勤汗水，我的论文不可能顺利完成；此外还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的孙燕京教授和首都师范大学的魏光奇教授对我论文的帮助；以及我的爱人对我的支持。没有他们的帮助和鼓励，我的论文不可能顺利答辩。谨在此对他们无私的帮助表示诚挚的谢意！